



真理报

第四期

7月31日 2025年

马列毛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砸烂披着团结皮的
修正主义分子！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马列毛协会报刊编辑小组
特别鸣谢：法国人民之火主席：张同志

毛

主

席

语

录

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时事评述

- ★ 评释永信事件 1-2
- ★ 评宗馥莉和宗庆后私生子女之争 3-4
- ★ 评旺仔小乔塌房事件 5-6
- ★ 纳粹主义在东方的复活-评电影《南京照相馆》 7-12
- ★ 官僚资本的狂欢，人民的灾难：马列毛主义视角下的杭州“粪水”事件评述 13-16
- ★ 评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 17-21

百家争鸣

- ★ 修正主义还是宗派主义？
——对“共产主义者”网站的批判 22-30

不周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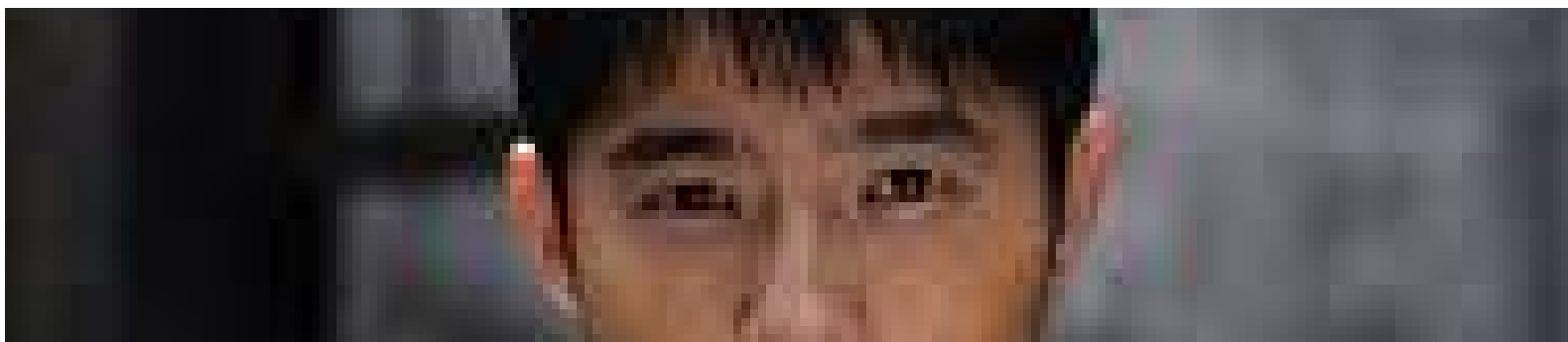
- ★ 捷克共和国禁止共产主义宣传 31

★ 欧洲声援印度人民战争与巴萨瓦拉 吉同志的新行动	32-34
★ CULPGIA: 关于解放乔治·阿卜杜拉的声明	35

历史文献

★ 共产主义原理	36
----------	----

导师语录	37
------	----



评释永信事件

2025年7月27日晚，嵩山少林寺管理处发布通报，宣布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挪用、侵占寺院项目资金和资产，并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育有私生子，严重违反佛教戒律，已被相关部门联合调查。次日，中国佛教协会宣布同意注销释永信的戒牒，强调坚决拥护依法处理决定。7月29日，少林寺管理处公告请印乐法师任新任住持，标志着释永信时代结束。公开资料显示，释永信（俗名刘应成，1965年生）自1987年起掌管少林寺38年，曾任中国佛教副会长、河南省佛协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长期活跃于政商宗教圈，被称为“穿袈裟的CEO”。这一事件披露后，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网民讽刺“少林寺成了香火庙的提款机，如今基建要钱，轮到庙里动手”，反映出公众对寺产商业化运作的质疑和不满。

宗教资本化的历史根源与现实表现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现象，其本质根源在于阶级社会的剥削与压迫。马克思曾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对现实苦难的幻想；正如他所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产生于“没有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社会。恩格斯也强调，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往往借助宗教麻醉民众、巩固统治。中国封建时代许多皇权和豪绅利用寺庙剥削农民（土地税免征、强征香火钱等），唐武宗时期的“会昌灭佛”即因国家财政压力和封建利益调配，将佛教视为“封建特权”肃清。

这表明，在封建社会，宗教既是统治工具，又常与阶级利益纠葛。当代宗教资本化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趋势。以少林寺为例，释永信长期推动“少林品牌化”运作。据财新报道，少林寺名下注册商标多达666项，涵盖禅茶、功夫游戏、少林药膳等领域；相关公司横跨文化、餐饮、医药等行业，年收入据估计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但寺院财务长期不公开。这一系列数据凸显出寺院不再只是信仰场所，而是深度嵌入资本市场的“商业帝国”。具体表现在：门票与旅游经济：少林寺每年接待数百万人次游客，仅门票收入就可达数亿元。文化输出与演出：组织武僧团海外巡演数百场，文化演出收入巨大。文创与IP开发：开发“少林”题材文创产品、网络直播、游戏联名等，注册商标逾百余件，带来可观收益。

这些现象说明，当前寺庙资本化已经突破传统宗教范畴，呈现出商业资本的典型特征。寺院通过开发品牌、扩张产业链实现利润最大化，将大量香火钱和捐赠金置于资本运营，逐渐异化了宗教场所的本质。这种“宗教资本化”既背离了宗教的度人初心，也为教众带来新的剥削和束缚，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官僧结合与宗教腐败的阶级属性分析



释永信现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官僧身份的交织与利益共享。释永信不仅是僧侣身份，更兼具国家政治头衔（如佛教副会长、人大代表等），形成政商宗教多重身分。这种官僧结合本质上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特别是地方官僚买办阶级）对宗教资源的侵占：

政治权力渗透：释永信利用其政治地位和外联能力，获取政府支持和政策便利，对寺产进行扩张和保护。

经济利益集中：他主导成立关联企业，掌控寺院财务决策，资源和资金审批权高度集中，外部监督缺失。财务不透明导致资金被私人渠道挪用，其个人薪资微薄却持有多处资产和企业股份，体现出对公众捐赠资金的私有化利用。

阶级属性突显：这一模式类似资产阶级对宗教的运作方式。释永信案显示出，宗教组织参与资本运作后，必然引发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管理矛盾。官僧结合把宗教资源变为剥削阶级的工具，其阶级属性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对立。简言之，释永信现象暴露了宗教领域资本主义化、官僧集团化的趋势。这种现象与无产阶级立场背道而驰，从阶级本质上看，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宗教界的渗透和腐蚀。正如马列主义所揭示的，宗教往往被统治阶级用作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教条主义与腐败分子混入其中，只会加剧宗教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桎梏和物质剥削。释永信现象与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关系释永信事件不仅是寺庙个案，更是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一面镜子。宗教领域长期充斥着封建迷信和资产阶级意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无产阶级思想形成冲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和人民正大力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文化阵地。释永信事件正体现了这一主流矛盾：一方面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文化（包括宗教资本主义）试图浑水摸鱼，传播腐朽思想的斗争。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强调，要“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一指导思想表明，宗教空间不能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思想渗透的渠道。释永信案的揭露，正是对反动宗教势力的一次震慑，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大斗争力度的态度。该事件提醒我们，宗教问题背后隐藏着重大的阶级利益斗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警惕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渗透，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保证人民思想阵地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在无阶级专政条件下正确处理宗教问题

在无阶级专政条件下，应按照马列主义宗教政策的原则，正确引导和管理宗教，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具体来说：

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与依法管理并重：中央政府一贯强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公民正常宗教活动权利；同时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反对非法宗教活动，防止任何宗教组织超越国家法律规定的活动范围。政教分离原则应贯彻到底，让宗教空间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

推进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宗教界支持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和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鼓励宗教人士学习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逐步剔除封建迷信色彩，将宗教信仰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宗教教义的发展方向。

加强寺庙管理和财务监督：落实寺庙法人制度，完善财务公开，群众监督和审计机制，杜绝个人独揽经费审批。对寺院经营行为进行严格规范，禁止寺产随意买卖和大规模商业投资；对违规者依法查处，防止寺院沦为少数人牟利工具。

深化群众性反迷信教育：动员党政宣传文化系统深入开展反对封建迷信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科学素养。大力弘扬劳动光荣、科学至上的思想，揭露迷信害人、宗教资本侵蚀的危害，使宗教教义为社会正能量所用，而非成为欺骗和剥削工具。

总之，正确处理宗教问题要在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加强党的领导和指导，做到“正确引导、逐步改革”相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无阶级专政条件下，引导宗教不断净化和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历史上宗教政治与阶级关系的演变比较

不同历史阶段的宗教政策体现了宗教与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

唐代佛教：隋唐时佛教极盛，深受皇室和士族阶级支持，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免税特权，成为封建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寺产膨胀严重、与世俗经济冲突，唐武宗“会昌灭佛”将大量寺产收归国有。此举既是统治阶级调整利益格局，也是封建官僚对宗教经济权力的制约，体现了封建专制与宗教势力之间的矛盾。

民国佛教：民国时期，政局混乱、军阀割据，宗教组织多附属于地方势力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集团常借助佛教等宗教团体笼络民心或反共武装（如西北佛教武装），形成官僧勾结的局面。民间佛教机构缺乏统一管理，很多寺院变成地方豪绅或商人的经济基地，反映了宗教在资产阶级和半殖民地社会中的畸形发展。共产党的政策则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同时揭露宗教与压迫阶级的联系，为后来土地革命中争取农民群众做好思想准备。

社会主义初期宗教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方面承认宗教信仰自由，重视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独立自主原则，一方面积极将宗教纳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体系。在50年代，“拥护、团结、教育、改造”四项政策（简称“四改”）针对宗教界制定：团结拥护真诚爱国的宗教人士，教育非中共的宗教教职人员，使之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顽固分子则进行改造甚至清除。通过三大改造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地主对宗教的控制。总体上，社会主义初期的宗教政策是限制宗教的封建特权，保护一般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并逐步引导宗教界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综上所述，中国宗教史上的几次重大调整，都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进行的。封建统治时期压制和利用宗教，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利用宗教巩固政权，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规范宗教活动、反对特权，以实现政教分离和引导宗教与时代相融合。当前释永信事件的出现，与历史上佛教被统治阶级利用的本质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对不合理现象进行矫正的延续。

结 语

综合来看，释永信事件揭示了宗教资本化、官僧结合的阶级本质和深刻社会根源。它提醒我们，宗教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宗教问题，而是深嵌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如同毛主席在分析矛盾时强调要抓主要矛盾一样，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用无产阶级立场去分析和解决宗教问题，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狠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净化宗教阵地。只有如此，才能防止个别僧侣披着宗教外衣进行资产阶级活动，让宗教真正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评宗馥莉和宗庆后私生子女之争

宗庆后（1946—2024）生前以“一妻一女”的朴素形象示人，被称为“布鞋首富”。他与原配施幼珍育有独生女宗馥莉（1982年生），宗馥莉2004年美国学成归国后，进入娃哈哈工作，2007年独立创办宏胜饮料集团，并长期被视作集团明确继承人。2024年2月25日宗庆后病逝后，宗馥莉开始接手其名下多家公司，陆续成为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浙江娃哈哈创投公司等法定代表人。2024年8月31日，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工商变更显示：宗庆后卸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宗馥莉接任上述职务。当时公司股东由三方持股——杭州市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国资）46%，职工持股会24.6%，宗馥莉29.4%。由此，宗馥莉通过遗嘱公证等程序，继承了父亲所持29.4%的娃哈哈股权。在此背景下，公众长期认为宗庆后家族仅有一妻一女，宗馥莉就是公司和家族事业的法定继承人。

三位“同父异母”子女背景及法律诉求

2024年底，宗庆后长年助手、前高管杜建英及其三名子女突然成为焦点。三位子女——宗继昌（Jacky Zong，1989年生）、宗婕莉（Jessie Zong，1998年生）和宗继盛（Jerry Zong，2017年生）声称是宗庆后与杜建英所生的儿女。媒体报道，杜建英曾为娃哈哈高层，长期负责进出口业务，并与宗庆后保持多年的私人关系。据媒体披露，宗继昌等人目前拥有美国国籍，其母杜建英曾在娃哈哈离职后成立多家关联公司并持股。这三位“同父异母”子女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提起诉讼，要求分享宗庆后遗产。他们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确认信托受益权：原告声称宗庆后生前在香港设立家族信托（每人约7000万美元本金），并委托宗馥莉为受托人；信托资产目前存放在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建浩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中。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该账户中约18亿美元为三人享有的信托财产，并禁止宗馥莉处置该等资产。确认股权继承权：三位原告同时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他们对宗庆后持有娃哈哈集团29.4%股权的继承权。

补偿和违约责任：他们控诉宗馥莉在2024年5月未经同意从信托账户划走108.5万美元用于支付供应商，违反了信托安排，要求索赔相关损失。

DNA鉴定请求：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宗继昌的出生证明，并申请调取宗庆后2023年入院时采集的血液样本，拟进行DNA鉴定，以证明亲子关系。

以上诉求反映原告主张：他们与宗馥莉是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均享有与宗馥莉“同等继承权”（参照2018年《非婚生子女权益确认书》）。他们提交了宗庆后手写的信托指示、委托书及三方协议等文件，力证信托的存在与分配方案。而宗馥莉方面则提交了一份2020年宗庆后签署的遗嘱，明确“所有境外资产由独女宗馥莉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任何权利”，并已通过杭州公证程序继承了娃哈哈股权。针对信托争议，宗馥莉及其律师表示，其父生前未完成正式的信托设立手续，汇丰账户资金乃用于市场拓展的运营储备金，拒绝承认原告的信托主张。

香港高院与杭州中院诉讼进展

香港高等法院（程序性裁决）：2024年12月30日，原告在香港高院提起诉讼，宗馥莉与建浩公司为被告，申请临时禁制令。2025年1月3日，法庭开庭审理。2025年8月1日，香港高院发布裁决，维持原告申请，对建浩公司在汇丰香港账户内约1.799亿港元（约合18亿美元）资金实施冻结，以确保杭州案审理期间资产保全。裁决披露：原告依据的三份文件包括（1）2024年1月底宗庆后手写的信托指示（每人7000万美元、仅取息用）；（2）2024年2月2日签署的《委托书》，委托宗馥莉设立3个离岸信托，受益人为三子女及其子孙，信托为“离本不动”，仅分配利息；（3）2024年3月14日宗氏四方签订的《协议》，其中宗馥莉（甲方）承诺以建浩公司香港账户资产为三兄妹设立信托。法院指出，截至该裁决，相关信托尚未正式成立，是否存在重大争议，须待杭州法院后续判决。此外，裁决明确了两份2024年2月2日遗嘱均未将三位原告或杜建英列为受益人，指定包括宗馥莉、施幼珍及宗庆后母亲等人为受益人。香港法院因此认为，虽然信托的有效性和受托关系仍在争议中，但冻结令有助于配合杭州诉讼程序，维护原告权益。目前香港高院案件只是程序性保全裁定，实质性信托成立与否、有益权归属，仍待内地判决解决。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实质性诉讼）：2024年12月，在香港诉讼的同时，三兄妹已向杭州中院立案，要求确认其对宗庆后29.4%股权的继承权（案号（2025）浙01民初123号）。杭州法院已对案件立案登记（2025年7月8日浙江高院受理登记）。



据报道，原告已提交身份和血缘证明，并申请调取宗庆后生前血样作DNA鉴定。杭州案尚未有公开判决，社会舆论普遍关注两案核心：信托设立的真实性、遗嘱的效力，以及股权继承的合法性。

娃哈哈股权结构及控制权继承

娃哈哈集团的股权结构长期复杂多变：以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其主要股东为杭州市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股46%）、娃哈哈职工持股会（24.6%）与宗馥莉（29.4%）。宗庆后去世后，其持有的29.4%股份通过法定继承程序归于宗馥莉，而其他股东为国资和职工集体所有。此次争议涉及的娃哈哈核心股权即上述29.4%。在控制权方面，宗馥莉已全面掌控家族企业人事和运营：她接任集团高管后，随即推动“宏胜化改革”，关停深圳、大理等地18家工厂，多与杜建英关联。另据报道，杜建英及其子女在陕西、双城、沈阳等娃哈哈子公司董事会中曾占席，而宗馥莉上任后，这些关联公司多被重组或停产。此外，宗庆后生前通过设立多家投资平台（如宏振投资、三捷投资等）间接控制娃哈哈部分资产。总的来看，宗馥莉不仅继承了娃哈哈实际控制权（29.4%股权和董事长地位），也在经营层面强化对家族资本的掌控。三位原告要求参与分割信托资产的行为，实质上意在分享家族其他海外资产收益，而非直接动摇目前娃哈哈核心股权格局。

家族资本治理与信托工具作用分析

宗庆后家族通过复杂的法律工具进行资本治理：一方面，在国内通过遗嘱与公证程序将主要股权和上市资产过渡给宗馥莉；另一方面，在海外运用信托结构规划财富传承。据公开信息，宗庆后早在2024年2月2日即签署了《委托书》，授权宗馥莉为设立人，创建三个不动本信托。该信托计划将汇丰香港账户约21亿美元分为三份，每份7000万美元本金用于固定收益投资，只分配利息给三兄妹。信托理应使这笔资金“脱离遗产”性质，通过法律手段切割所有权、控制权与收益权。媒体分析认为，这种安排将资金名义上归建浩公司，但实际控制和受益由信托结构约束，可实现跨国资产的隐蔽管理。信托被视为富豪家族常用的继承工具——既可避开直接遗产分配，也增强资产隔离功能。然而，此次事件表明家族信托安排存在巨大争议。原告诉称，宗馥莉未按《委托书》和协议约定签署正式信托合同，信托并未实际成立。香港高院认定信托成立存在“重大争议”，故暂不做最终判决。



评旺仔小乔塌房事件

事件起因与主要争议点

网络歌手旺仔小乔（本名乔钺凝）在抖音拥有逾2300万粉丝，2025年7月中旬宣布将于8月在上海举办首场“探索者”蒙面演唱会，引发轩然大波。其蒙面演唱会门票价位超出常规：最低票价268元，内场最高968元（与一线明星演唱会相当）。由于全程不露脸且90%为翻唱曲目，公众质疑其“割韭菜”炒作动机。演唱会信息公布后，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多方焦点集中在“不露脸”、“原创歌曲少”、“内外场价差大”、以及“不知是否真唱”等问题上。与此同时，旺仔小乔与《年轮》一歌的版权归属争议升级。她在直播中坚持称《年轮》“原唱仅张碧晨”，而实际上该曲由汪苏泷作词谱曲，张碧晨与汪苏泷为双原唱。此言一出，即触动原作者方底线，汪苏泷团队随即撤销了歌曲授权，张碧晨也声明将不再演唱此曲。此版权纠纷引发舆论批评，认为旺仔小乔故意颠倒是非。舆情迅速发酵后，她于7月26日晚在社交平台发布公开道歉信，承认演唱会筹办和言论引发公众不安，承诺接受批评；但此信被网友检测出高达97%重复率，被指模板化、缺乏诚意。不久，8月9日上海演唱会因“艺人身体原因”延期，主办方公布低价退票、报销差旅等补偿方案。此外，有前员工和签约艺人曝出内部管理丑闻。有合约艺人称她与母亲带人半夜上门堵门索赔，水电被切断，辞职员工被迫赔偿数十万元，甚至遭到殴打威胁。直播中，她还曾直接公开批评粉丝：“你给我刷过100万吗？你都没有给我刷100万，我鸟你干什么呢”（意即“你未曾为我贡献百万打赏，我凭什么理睬你”）。种种负面新闻集中爆发，引发了社交平台上一片反感和批评浪潮。主要争议点可归纳为：演唱会形式与票价争议（低成本高定价被视为“薅粉”）；歌曲著作权纠纷（擅自宣称原创，侵犯作者权利引发公愤）；道歉信事件（稿件高度重复、回避问题，令粉丝更愤怒）；粉丝关系失和（粉丝投入大额打赏却得不到回馈，被辱骂和威胁）。

公司运营与资本运作模式

旺仔小乔的走红并非完全草根偶然。据企业信息显示，她自组运营公司：2024年3月，她成立了注册资本500万元的“安徽星桥火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名列法定代表人（随后在状态显示零员工）；2023年，她本人个人独资成立“齐奥音乐文化工作室”，并尝试注册“旺仔小乔”商标。她在抖音上的节目“星辰之乔”亦由星桥火树负责运营。这些迹象表明，旺仔小乔并非纯粹的个人偶像，而是由特定资本和团队操盘的产物。资本运作层面，她先后与大平台、大厂资源合作。2022年以来，她成为腾讯音乐人联合出品的歌手，发布多首翻唱歌曲；2024年起，又在安徽星桥火树下推出原创作品，词曲由本人创作。有分析指出，即便拥有千万粉丝，想要首办大型演唱会也需强力资源支持，业内传闻华纳音乐参与了演唱会筹备。这暗示其背后有强大资本运作和人脉支撑：资本利用她的高流量来联合推广，同时为其提供更高层级的舞台。母亲在运营团队中据称扮演重要角色。

有前合伙人爆料称公司合约管理混乱，分红承诺多为口头；一旦发生纠纷，对方就被索赔数十万元甚至带人堵门威胁。7月爆出的内幕中，多位曾合约艺人提到旺仔小乔本人和其母亲带人骚扰辞职艺人，对方被迫赔偿或退让。有评论直言其所作所为酷似“黑社会行径”，凸显其运营模式并非正规契约管理，而是强人逻辑主导、严重依赖私权力。这些信息揭示了旺仔小乔的公司运作并不透明，其母亲及团队通过权势整合资源、压榨合作者和粉丝，形成了一种“带有江湖色彩”的资本玩法。

社交媒体的公众与粉丝反应

社交平台上，公众舆论几乎一边倒。事件爆出后，各大平台相继对旺仔小乔账号采取了惩处措施：截至7月29日，她的微博被禁言，抖音和小红书被禁止关注。与此同时，她的粉丝数从事发前的2345万，短短10天内跌至约1900万，狂掉粉数超过400万。网友纷纷“拍手称快”，指责其违背主流价值观，称“早该封杀”。

大众评论普遍认为：偶像靠的是群众的支持，一旦对群众失信必然“自食恶果”。事件也成为网络嘲讽的“全民娱乐”。众多网民和自媒体将旺仔小乔的口头禅“你没有给我刷100万，我干吗鸟你”制作成各种恶搞视频和表情包，并引发连锁模仿。

如景区“五朵山”官方微博便玩梗回应“记得带一百万！”，众多旅行社、文化账号紧跟梗战，网友评论区花样百出，一时让气氛热闹非常，堪称把原本的负面新闻变成了全民狂欢。这些反讽和戏谑反映出公众对流量偶像商业套路的清醒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主张理性声音在呼吁避免网络暴力。如《新京报》评论指出，公众对不露脸演唱会有权提出质疑，但对于艺人本人的人身攻击则越界。媒体强调，艺术争议可以讨论，但信息公开透明，观众拥有选择权；抨击谣言和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已涉嫌违法，呼吁公众保持基本尊重。相反，也有少部分极端粉丝试图为偶像辩护，引发与其他网民的言语对峙，但主流舆论对强人手段和所谓“粉丝剥削”抱以谴责，整体舆论风向已明显转向不满和反思。



主流媒体与评论态度

主流媒体在报道旺仔小乔事件时，整体保持客观中立的报道基调，尽量将讨论聚焦在事实本身。观察者网等平台转载了旺仔小乔的道歉信全文，并介绍其背景：其为00后翻唱歌手，2020年以蒙面唱歌走红，粉丝曾达2291.9万；近日宣布将以蒙面形式办演唱会，由此陷入争议。报道基本只陈述事件经过，不予价值评判。新华社等官媒及主流报刊则引述官方消息、行业规范，对延期措施和补偿方案进行报道，多以“尊重市场规律”、“保障消费者权益”为导向。与之不同，《新京报》评论聚焦网络舆论环境，强调讨论要有度，呼吁抵制网络暴力。整体而言，主流媒体更多强调依法依规办事、尊重消费者权益和媒体责任，不随意跟风谩骂，也提醒守住理性底线。自媒体和评论文章则倾向于直接批判流量明星文化。电子商务派等评论文章直言旺仔小乔“作死”必亡，痛斥其嚣张行径“自食其果”；一些博主抓住道歉信中的“模板化”字句加以讽刺，认为其粉饰太平、避重就轻，真正的诚恳应是直面过错而非敷衍了事。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留几手”也公开点评道歉信，指出其回避主要争议、缺乏分析和检讨，称“真诚要敢于正视自己”。此类评论普遍角度直指流量生态：粉丝被宠坏后视情感为资本，而艺人亦将粉丝当韭菜收割，必然自取灭亡。这些声音与官方媒体的调性形成互补：前者以尖锐批判促使公众反思，后者以宏观视角倡导理性对待。

流量经济与资本主义文化机制本质

旺仔小乔事件的纷争暴露了流量经济时代娱乐产业的本质逻辑：资本如何制造偶像、操纵舆论、牟取剩余价值。表面上，这是一场演唱会和版权争议的舆论风暴；深层次看，却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娱乐文化上层建筑问题。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流量即财富与话语权的象征。正如学者所言，数字时代粉丝文化背后的资本逻辑正在发挥主导作用，粉丝逐渐沦为“免费劳工”，为偶像经济生产剩余价值。具体而言，平台算法和粉丝打榜将情绪消费转化为数据流量，进而吸引企业和广告投资，从而实现资本增值；粉丝的每一次刷榜、打赏，都是为资本创造利润。艺人和唱片公司提供的并非单纯艺术，而是经过包装的商品，其价值更多在于能够产生关注与金钱回报，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贡献。这一机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吻合：娱乐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却被资本利益改造为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粉丝崇拜中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倾向其实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烙印，它强化了“追求名利即正当”的意识。旺仔小乔自诩“为粉丝传递正能量”的说辞，实际上背离了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她的案例验证了艺术一旦脱离群众需求、沦为赚钱手段，就必然以牺牲精神追求和社会责任为代价。流量明星的价值评判更易受到资本市场起伏左右：他们可能暂时享受群众追捧，但最终会被批量生产的“下一个新人”所替代，正如流量经济规律所决定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对当代青年意识形态和文艺消费倾向的影响

此事件对当代青年意识形态和文艺消费观念也具有警示意义。一方面，它暴露了部分青年在偶像崇拜中的盲目性：粉丝往往对网络偶像给予高度信任，以情感支持换取心理满足，却忽视了对偶像背后资本结构的审视。当偶像失德、事件曝光时，一些青年会陷入失望甚至幻灭，这是被剥削后的觉悟。另一方面，旺仔小乔事件提醒青年文化消费要讲求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毛主席强调的群众路线告诉我们：文化产品应扎根人民、反映人民需求，而非迎合少数人的私利或虚幻幻想。青年人如果一味追求“偶像+消费”的刺激，就容易形成唯名利是图的错误价值观。此次事件让不少年轻粉丝认识到，娱乐偶像本质上也不过是资本操盘下的商品，其价值不应神化，应学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视流行文化。从积极意义看，当群众觉醒、对资本逻辑有所警觉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主流媒体呼吁的理性和法律底线、以及社会舆论对资本逐利本性的揭露，都对青年产生了教育效果。粉丝群体经历阵痛后，可能更加关注艺人的人品和作品质量，而不是盲目追星。这与毛泽东“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念相契合：健康的文艺消费应以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为目标，而非单纯博取眼球。总结而言，旺仔小乔事件既揭示了流量文化对青年价值观的侵蚀，也为矫正这一倾向敲响警钟，提醒年轻一代在娱乐消费中保持清醒的阶级立场和群众观点。



纳粹主义在东方的复活-评电影《南京照相馆》

2025年中国历史剧情片《南京照相馆》宣传海报，影片取材自南京大屠杀史实。该片上映后票房飙升，并引发关于“仇恨教育”的激烈讨论。

引言：历史题材与意识形态

2025年上映的影片《南京照相馆》以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叙述一群南京平民在照相馆内保存侵华日军暴行照片的故事。影片上映后票房斩获十余亿元，成为年度现象级大片，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然而，这部以民族创伤为题材的电影在赢得主流赞誉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狭隘民族主义和“仇恨教育”的争议。马列毛主义视角下，我们有必要对《南京照相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进行深刻批判，剖析其如何通过集体记忆来转移阶级矛盾、美化国家形象、影响受众意识，并服务于当代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再生产。

狭隘民族主义：利用集体记忆转移阶级矛盾

《南京照相馆》借民族悲剧激发爱国情绪，但其叙事体现出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这类民族主义表面上为受害民族鸣不平，实则盲目而缺乏辩证思考，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类似，属于极右思潮。



正如有影评指出：“民族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局限化和曲解”。近年来中国抗日题材作品层出不穷，但群众需要的并非更多仇恨教育，而是清醒的阶级斗争意识。影片通过渲染历史仇恨，某种程度上将社会关注从当下尖锐的阶级矛盾引开，把人民的愤怒投向历史敌人和外部民族，从而掩盖现实中的剥削与压迫。马列毛主义强调，真正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矛盾，而非抽象的民族仇恨。在资本对劳工的剥削依然严重的当下，却有不少文艺作品纵容民族对立、淡化阶级剥削，这无疑是一种倒退。正如该影评尖锐地批判的：“不应该一边大量地放任民族对立，一边对资本的剥削熟视无睹……我们仍然为朴素而狭隘的‘爱国情怀’叫好叫座，愈发掩盖更深层的问题”。这种利用集体记忆转移矛盾的做法，只会让真正导致民众苦难的体制性问题被遮蔽。



具体而言，影片聚焦日军暴行，激起观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这是狭隘民族主义叙事的典型手法。例如，电影大篇幅展示日军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以血腥恐怖的影像冲击来强化仇恨记忆。

但与此同时，影片对导致南京陷落的大背景却轻描淡写：它既没有深入探究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也没有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奉行不抵抗、妥协退让政策的反动性。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分析告诉我们，1937年南京大屠杀悲剧的发生，不仅因为日帝国主义侵略，更源于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卖国路线和对人民抗战力量的压制。然而《南京照相馆》对此只字不提，好像当时社会唯一的矛盾就是“中国人民 vs. 日本侵略者”，仿佛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就本可岁月静好。这种叙事用民族矛盾取代了阶级矛盾，模糊了侵略发生的内因，正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其结果是，把应有的对本国压迫者和统治阶级的批判，转移成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从而减轻了现存统治阶级所承受的压力。正如有评论直言，这类影片“都是通过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阶级矛盾”。集体记忆在这里被利用为一种工具——统治者鼓吹“勿忘国耻”，表面看是爱国教育，实际上却可以成为凝聚民族情绪、淡化国内阶级对立的手段。马列毛主义认为，人民牢记历史是为了汲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并争取真正的和平；如果这种记忆被用来煽动对他国人民的普遍仇恨，而不去正视当下的阶级剥削，那么这种教育就蜕变为反动的“仇恨教育”。在该片放映后，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有家长在影院教唆幼小的女儿“要杀死日本人”，孩子含泪回答“知道了”；更有9岁男孩看完电影回家撕毁心爱的日本漫画和奥特曼卡片，以示对日本的仇恨。这些场景表明，狭隘的民族仇恨正被灌输进新一代的头脑。一些有良知的网友警示，不要让儿童的纯真成为宣传仇恨的工具，“我们牢记历史是为了维护和平……绝不是为了煽动仇恨”。然而官方媒体对此持反驳态度，否认影片是在宣扬仇恨，声称质疑者是在“污名历史纪念”为“仇恨教育”。显然，《南京照相馆》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狂热正在替代理性的历史反思，集体记忆被狭隘地运用于激发对外仇恨，而非促使人民思考自身所受的阶级压迫。对于马列毛主义者而言，这是对历史记忆的功利性歪曲，也是对人民真正利益的背离。革命导师早已教导我们：“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也就是说，仇恨应该针对侵略人民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卖国贼，而不应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盲目憎恨。很遗憾，《南京照相馆》没有传达出这样的辩证立场。它所营造的民族愤懑，更多服务于宣泄情绪，而非引导群众认清真正的敌人和矛盾根源。



国家形象美化与帝国主义虚伪性

影片在叙事上极力美化中国一方的形象，将民族苦难转化为歌颂民族精神的素材。这种对中国国家和民族形象的正面塑造表面上激励人心，实则充满虚伪性，尤其当置于当代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时更是如此。在《南京照相馆》中，中国人被塑造为团结、勇敢、富有道德力量的群体：一群普通市民在腥风血雨中守望相助、舍生取义，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黑夜中的坚强不屈”。官方评论盛赞影片“以小见大地反映并批判了法西斯主义”，同时刻画出“小邮差、小老板、小演员咬牙坚持生存”的故事，隐喻中华民族涅槃重生的精神。评论特别提到片中照相馆老板以山河背景为家人拍下最后全家福，展示了“中国人的坚韧不拔、中华文化根脉的绵延不绝”。这种叙事和评论，无疑是在极力美化中国人民的形象，把民族精神升华为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在电影的结尾，这种民族自豪感达到顶峰：主人公等以生命换来真相传播，寓意中华民族迎来了“艰难新生中的历史一页”。主流舆论强调，影片契合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大背景，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提供了新的影视表达。这种浓烈的爱国主义叙事，塑造了一个受难但高尚、积弱而抗争的民族形象，仿佛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后凤凰涅槃、愈发辉煌。然而，在马列毛主义看来，这种对国家民族形象的单纯美化是经不起质疑的，其背后隐藏着当代中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巨大虚伪性。首先，影片对历史的呈现就有选择性、美化性的倾向。剧中暗示侵华日军入侵前的旧南京“市井烟火、幸福家庭”一派祥和——这种描述完全避开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腐败和民生疾苦。事实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大多数劳动人民饱受贫穷和压迫，底层生活谈不上什么“幸福安宁”。南京大屠杀固然是外来侵略者造成的大悲剧，但若没有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对内独裁和对外妥协，人民本可有更有效的抵抗。影片却将旧社会浪漫化，好像1937年前的中国是美好的乐土，只因日寇铁蹄才打破了宁静。这无疑是在客观上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粉饰太平，把本应揭露的反动统治问题加以遮盖。这种“历史温情”策略服务于当代官方的民族叙事：通过突出外敌之残暴，来烘托本民族之无辜高尚。对比之下，一些马列毛主义者指出，真正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叙事，会对一切压迫人民的反动派一视同仁地加以谴责，

而不会只拣特定的外国侵略者大书特书、对本国剥削阶级的暴行却轻描淡写。如今的官方宣传只字不提曾在历史上屠杀中国人民的法国、俄国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暴行，也很少提及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镇压，却反复渲染日军的罪行。对地主、买办阶级甚至时有美化之词，这难道真是出于纯粹的“民族大义”吗？这种选择性的失明，恰恰暴露出宣传者的虚伪：他们高喊反法西斯、反侵略，却自己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正如一篇左翼评论质问的：“中修（指当代中国修正主义当局）这样做就是为了渲染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地主阶级、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其它列强侵略者都被置于无足轻重甚至只字不提的地位上。这难道还不能暴露出它的虚伪吗？”官方对日本侵略的批判，并非像毛主席当年那样明确地区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本身；相反，当局是抽象地谈论“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仇恨，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历史也只剩下庸俗的“家国情怀”叙事。抗战胜利的革命意义被偷换成空洞的民族复兴神话，这实质上是在借历史为现政权背书。今日中国政权自我标榜为民族复兴的领航者，将自己与抗战胜利的辉煌直接相连，而绝口不提如今的社会现实早已偏离了当年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人民解放道路。这种民族叙事的美化作用在于令大众将爱国等同于爱执政党，把国家荣誉等同于执政集团的合法性。在民族苦难的记忆包装下，官方成功地将自身打扮成民族英雄、正义化身，获得道德豁免权。然而，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揭穿了这种把戏的本质：当年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正义之战，而今日的执政集团早已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宗旨，蜕变为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利用抗战记忆装点门面，另一方面却在现实中奉行着社会帝国主义的路线。当局热衷宣扬民族仇恨和胜利荣耀，却很少反思自身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行为。可以说，《南京照相馆》中的民族形象美化，折射出当代中国统治阶级自我粉饰的需要。马列毛主义者指出，当局宣传抗战历史时“大肆美化汉奸甚至美化侵略者（比如在抗美援朝影片中美化美军）”，其实正是因为它们自己就是新形态的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分子，早已与当年的民族败类和侵略者成为“一体两面”。当代中国充当帝国主义势力，它在经济上对外输出资本、掠夺资源，在周边地区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对内则高压统治、镇压工农，这与其口口声声的“受害民族”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虚伪性正是值得警惕之处：正如论坛评论所言，中共修正主义当局自己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了，不可能站在真正人民立场上拍出真正进步的电影。他们标榜的爱国主义，本质是为了服务于其争霸世界的野心。因此，对《南京照相馆》中中国国家形象的歌颂与美化，我们应保持清醒的批判立场。民族精神的赞美如果脱离了对现实阶级压迫的关照，只会沦为统治集团自我宣传的工具。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看待民族问题必须同阶级问题相结合；脱离了阶级内容的纯粹民族赞歌，很容易蜕变为维护剥削秩序的遮羞布。

受众狂热：“小粉红”的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内化

《南京照相馆》的上映在观众中，特别是在所谓“小粉红”群体中，引发了狂热反响。这些深受官方民族主义 discourse 影响的年轻网民，将对影片的拥趸视为一种爱国表态，把民族主义情绪与自身的文化认同紧密绑定，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高度内化。社交媒体上，大批“小粉红”观众为影片叫好，称其为“近十年来中国拍得最好的反法西斯电影”，兴奋于电影里日本侵略者被刻画得“纯粹邪恶”，汉奸下场凄惨。有网友激动地评论这部影片“拍得解气”，认为“这才是我们该拍的抗日片”，甚至有人号召“这类题材我们应该多拍，拍深刻，不要讲什么以德报怨”——可见相当一部分观众将影片视作发泄民族仇恨、宣扬“零和”爱国主义的出口。正如左翼论坛上总结的：“网上小粉红是狂欢了，说这电影是多少年来最好的电影，突出日本人纯坏”。这股狂热背后，是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在近年来官方爱国主义教育下被塑造出的思维定式：凡是揭露日本罪行、渲染民族仇恨的作品，就是“有良心”“有骨气”，理应被追捧；反之，任何对这类影片的批评质疑，都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举例来说，当少数自由派网友谨慎地批评影片可能在灌输仇恨教育时，立即遭到主流舆论的围攻。《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火速发文，指责这些网友是在“抹黑历史纪念”，给爱国电影泼污水。亲官方的评论者更是辩称：西方人强调爱国就是正当，中国人强调爱国就被斥为民族主义，这是“双标”。有文章（署名“老猫”）公开宣称，《南京照相馆》不是仇恨教育，而是“占领舆论高地的尖刀”——电影是为了在舆论战、宣传战中抢占先机，让观众“分清敌友”，此举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正面反击”。这种论调将观影爱国等同于参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把爱国主义上升到与敌对势力斗争的高度来正当化观众的情绪反应。可见，“小粉红”群体对影片的狂热拥护，已不单是文艺喜好，而是体现出他们将国家意识形态内化为自身信仰、主动在舆论场充当爱国卫道士的姿态。对于这些观众来说，看《南京照相馆》、流泪痛恨侵略者，俨然成为一场爱国仪式和文化认同实践。他们以对日本的愤怒来证明自己对民族的忠诚，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非黑即白的情感对立，在情绪宣泄中获得身份认同的满足。马列毛主义分析认为，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功灌输的结果：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媒体将狭隘民族主义包装成正当的“爱国”价值，使广大群众——尤其是缺乏社会阅历和阶级分析能力的青年——自觉接受这种观点，并将之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内化的意识形态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它模糊了阶级立场。



很多“小粉红”出身普通家庭、本属劳动人民，却在民族主义狂热中认同了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忽视了对自己阶级利益的侵犯。例如，他们热衷喊出“勿忘国耻”“珍惜今天的和平繁荣”，却很少追问当下是谁在分享繁荣、谁在承受苦难。当一些青年失业、996加班、买不起房时，他们更容易归因于外国制裁打压或历史遗留问题，而非本国资本剥削和体制性不公。这种错置的认知，正好符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让人们把愤懑投向外部的“敌人”，而不是质疑内部的剥削秩序。其二，它将人民与统治者绑在一起，以“民族共同体”掩盖内部的阶级分裂。在民族主义话语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仿佛全国人民包括官僚资本家都是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些青年由衷地相信当前的党和国家依然代表人民利益，因而把爱国与拥护现政权划等号。当有人批评政府或揭露社会不公，他们就痛斥对方“抹黑中国”“汉奸卖国”，完全以统治者的代言人口吻来说话。这种现象正如论坛上的马列毛主义者所指出的：一个民族内部本来就分裂为不同阶级，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是占人口多数的被剥削阶级；而垄断资产阶级鼓吹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想要让本民族劳动人民替他们卖命，同时去奴役其它民族罢了。当劳动人民相信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充当炮灰，在需要时为统治者赴汤蹈火，却对自身所受的阶级压迫麻木不觉。这不正是许多“小粉红”式爱国青年所呈现的状态吗？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口口声声“民族复兴”、“强国梦”，却忽视了现实中垄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官僚特权对平民的盘剥。更有甚者，当国内底层群众起来抗争时，这些人往往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将工人罢工、农民维权污蔑为“给国家抹黑”，而对当局的强力镇压喝彩助威。这种颠倒的立场说明，他们已经深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泥淖，将民族主义当作高于阶级利益的绝对真理。归根结底，《南京照相馆》激发的受众民族主义狂热，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小粉红”群体如何被塑造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他们把民族认同与爱国热情混为一谈，却忘了问一句：谁的国家？谁的民族？正如革命理论告诉我们的，在阶级社会中，“代表一个民族的从来都是占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当“小粉红”们高喊爱国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用被剥削阶级的血汗，去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错位的意识，正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高明之处，也是革命宣传需要努力扭转的方向。



马列毛主义视角下的意识形态批判：反帝反修与主流宣传

要全面理解《南京照相馆》背后的国家宣传逻辑，需要回到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阶级斗争、民族压迫、反帝反修等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武器。从阶级斗争视角看，影片用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的做法，是对阶级斗争哲学的背弃和歪曲。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归根结底是垄断资产阶级争夺利益的产物，其给被侵略民族带来的苦难，需要通过被压迫阶级的联合斗争来解决。而《南京照相馆》所呈现的，仅仅是中华民族被压迫、反抗侵略的表层图景，却没有点出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体系，更没有表现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阶级力量对比和政党作用。例如，影片中完全看不到中国共产党这一抗日战争中最坚定的先锋力量，也没有提及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这种“先锋政党概念的缺席”，使得影片的历史观局限于民族受难和小人物的自发抗争，缺乏对组织化的革命运动的呈现。这恰恰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刻意选择：淡化共产党革命历史的阶级内容，将抗战胜利仅归功于模糊的“民族精神”或国民党政府的正面形象（影片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片面避战的批判几乎为零）。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叙事等于抽掉了历史的灵魂，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组织斗争，就不可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将抗战简化为一场“正义民族”对抗“邪恶民族”的斗争，而不触及背后的阶级和政党因素，正是资产阶级史观的体现。它的危险在于，让观众只看到民族仇恨，却看不到帝国主义兴起的资本逻辑、看不到人民革命力量的关键作用，从而难以汲取真正的历史教训。



马列毛主义关于民族压迫与民族主义的理论指出，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有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正义性，但同时必须警惕本民族统治阶级利用民族矛盾来服务自身利益。当年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也防范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战的消极乃至叛变。然而，《南京照相馆》的意识形态倾向却是将所有复杂因素简化为民族间的绝对对立。这种过度简单化的民族主义叙事，实际上掩盖了阶级压迫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卖国行为，并把阶级斗争引向民族对立的歧途。例如，电影努力“洗白”了一些历史上的汉奸形象：剧中翻译官、逃兵、艺伶等角色，本是为日本人服务或逃避抵抗的人，却被刻画成“本意善良，只是被迫为之或一时糊涂”，甚至在剧情需要时瞬间良心发现、壮烈反抗。这种对汉奸行为的人性化处理，看似增加剧情复杂度，实则宣扬了一种危险的“人性论”观念：仿佛阶级立场和卖国行为都可被道德化、个人化，从而回避对民族败类的阶级批判。马列毛主义一贯主张，对待内外压迫者和叛徒都应采取坚决的斗争态度。毛主席当年就教导：“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败类才是我们的敌人”。这种清晰的敌友界限，体现的是基于阶级分析的民族斗争观：侵略者固然凶残，但若没有本国反动派里应外合，人民不会陷入那般绝境。因此，对于汉奸卖国贼，绝不能用“他们本心不坏”来开脱，而应揭露其阶级动机——要么是出于自身利益苟且偷生，要么是代表买办阶级出卖民族。这种尖锐的阶级批判在影片中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民族和解叙事：连给日军当翻译、为日军唱戏的人，最终都被描写成觉悟抗争的“自己人”。这实际上模糊了抗战时期敌我阵营的阶级本质，也为现实中某些统治阶层的“爱国”形象涂脂抹粉（要知道，今日许多鼓吹爱国主义的权贵，其父辈正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汉奸或附日分子）。这种叙事策略，服务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它告诉观众，民族大义高于一切，以致连曾经的叛徒也可因民族大义而感化；更隐蔽地，它暗示现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对民族也是忠诚的，人民不应再以阶级眼光怀疑他们的爱国姿态。



从反帝与反修（反对修正主义）的角度看，《南京照相馆》的出现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环。当代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常以“中修”指代中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认为自上世纪后期起中国共产党内部资产阶级上台，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道路。这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对内镇压工农、对外争夺势力范围的新兴帝国主义强国。在这种背景下，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极力鼓吹民族主义，以凝聚国内人心、为对外扩张和潜在战争做舆论准备，另一方面又粉饰太平、掩盖自身的法西斯压迫本质。正如左翼评论所揭示的：“中修搞这部电影其实只是在宣传对日本人的仇恨，为未来的世界大战做舆论准备而已”。联想到近年来官方在外交上日趋强硬、中日因台湾和钓鱼岛等问题关系紧张，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失业上升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我们不难理解当局为何需要一部票房火爆的抗日大片来转移视线、凝聚民心。一方面，它可以激发大众的爱国激情，将现实的不满与焦虑重新导向外部“仇敌”；另一方面，它在无形中为可能的对外军事冲突做心理动员——当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从小接受“日本人如何灭绝人性、我们必须复仇雪耻”的教育，他们更易于接受将来对日强硬乃至战争的选项。这种舆论准备，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争霸前奏。然而，这一切都披着爱国正义的外衣，以至于很多群众意识不到自己成了棋盘上的卒子。马列毛主义的反修理论早已批判过这种现象：修正主义统治者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实则让劳动人民为其霸权野心卖命。他们鼓吹的“爱国”，除了让工农子弟去前线冲锋、去替垄断资产阶级争夺利益外，没有任何进步意义。而当国内劳苦大众揭竿而起反抗剥削时，这些统治者对本国人民下手之狠毒毫不亚于任何外敌。历史上，蒋介石为首的买办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不惜“引狼入室”，纵容日军侵华（“攘外必先安内”）；面对日军进攻时却消极避战、节节败退，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还制造了花园口决堤淹死几十万同胞的惨剧。而当战争胜利在望，他又妄图抢夺抗战果实，排斥共产党力量。这些反动阶级的卖国与屠民双重嘴脸，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映照。当代以习近平为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样奉行对内高压统治、对外穷兵黩武的方针。他们对内强化专政机器，打压工人罢工、封杀言论自由，以维持其统治秩序；对外则一面挥舞民族主义大旗与他国对抗，一面在需要时不惜牺牲人民利益与帝国主义势力交易。归根结底，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一切剥削阶级都是民族的叛徒。因为当他们的统治利益受到本民族人民挑战时，他们比任何外敌都更凶狠地镇压人民；而当其统治受到危机时，又可能出卖民族主权换取外国支援。

由此来看,《南京照相馆》所体现的官方民族主义,只是统治阶级工具性的策略。他们高调纪念抗战、痛斥日军暴行,但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反帝立场,而是为了在新的帝国主义博弈中占据道义和舆论优势罢了。如果他们真有反帝反侵略的决心,就不会在现实中对别国军国主义旧势力心慈手软,更不会对内剥削本国人民。正如有左翼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中修自己就是法西斯、就是帝国主义,汉奸和侵略者是一体两面”。当今中国当局对外宣称自己是二战战胜国继承者,但他们忘了说明: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昨天的中国。昔日带领人民赢得民族解放的是无产阶级政党,而现在掌权的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昔日反帝是为了人民翻身做主人,而今鼓动民族主义则包含着新的霸权欲望与资本扩张冲动。正如《南京照相馆》导演在采访中直言不讳的那样:抗日战争不仅是历史上的真刀真枪的战争,至今仍是一场舆论战、宣传战和文化战,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分清敌友”。这番话道破了影片的意识形态本质:它就是当局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群众进行敌情教育和战备动员的工具。而问题在于,当局让人民分清的“敌友”,真的符合人民的阶级利益吗?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最凶恶的敌人不仅有外国帝国主义者,也有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而真正的朋友,则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劳动人民。遗憾的是,《南京照相馆》输出的“敌友观”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层面:日本人(泛指)都是仇敌,中国人(泛指)都应同仇敌忾。这种思维模式恰恰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它不断重申执政集团一贯宣扬的简单历史观和民族观,使大众习惯于从民族情感出发看问题,而忽视对阶级本质和制度弊端的追问。在这种意识形态氛围的熏陶下,每一代观众都会在不自觉中接受统治阶级设定的“爱国主义”框架,从而巩固了现存秩序的思想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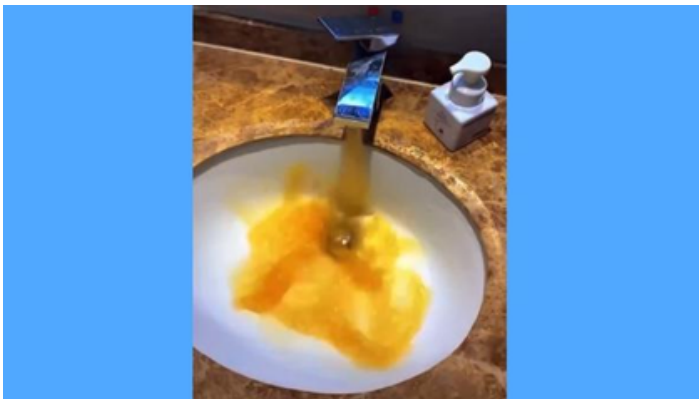


结语:警惕民族主义叙事背后的阶级迷雾

总而言之,从马列毛主义立场出发,《南京照相馆》尽管打着纪念历史、弘扬民族精神的旗号,实则在意识形态上体现出狭隘民族主义的偏向和当代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宣传的深层用意。影片通过对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挖掘,引燃了公众的民族情感,却将这种情感引向对外仇恨和民族自豪,而非对内省思和阶级觉醒。它美化了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却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历史和现实中统治阶级的失职与罪责,在当代中国已沦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虚伪。影片引发的“小粉红”式狂热,表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已深入年轻一代的意识,民族认同被等同于对统治秩序的认同,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成功再生产的表现。通过分析《南京照相馆》,我们看到当局如何利用爱国主义影视再现历史创伤,一方面凝聚民意、驱动社会情绪,另一方面也在重塑着有利于其统治的意识形态版图。在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下,经济放缓、社会矛盾潜滋暗长之际,此类影片的热映绝非巧合,而是权力者转移矛盾、巩固统治的一记棋招。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要真正捍卫民族利益,就必须超越庸俗民族主义的迷雾,认清阶级斗争的主轴;要真正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就不能只仇外而不反内,不能让统治阶级以爱国之名化解其自身危机。唯有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穿主流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陷阱,才能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既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也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独裁剥削。在纪念历史创痛之时,我们要警惕那些打着历史旗号的民族主义狂热,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阶级意识被民族仇恨所吞噬。正如毛主席所言,人民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让我们谨记这一教导,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分清真正的敌友,把对历史的悲愤化为反抗一切压迫的力量,而不做民族主义迷雾中的盲从者。只有这样,才能既告慰先烈,又奋力开创真正属于人民的未来。

官僚资本的狂欢，人民的灾难：马列毛主义视角下的杭州“粪水”事件评述

2025年7月，杭州余杭区部分社区自来水流出黄浊且恶臭的液体，居民戏称自己被迫在“吃屎”。此起被称作“粪水”的自来水污染事件波及49个村社、数万群众，不少人出现皮肤瘙痒、腹泻、发烧等不适。面对民怨，当地水务公司仅象征性地每户减免5吨水费（折合人民币不足15元），仿佛用14元就打发居民吞下粪水的屈辱。官方最初宣称异味源于高温导致藻类分解产生硫醚化合物，是“天灾”而非人祸。然而公众质疑四起：深埋地下且含氯的自来水管网中藻类难以大量滋生，此说法缺乏基本科学依据。很快，官媒改口承认供水异常，但强调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同时警告网民不得传播“粪水”谣言。在所谓通报中，真正受问责的是试图探明真相的网民，而非让老百姓“吃屎”的权贵公职人员。杭州市随后宣布对涉事的水务集团干部和区政府官员共7人予以处分，但除一名党委委员被撤职外，其余不过是记过警告等轻罚，且通报甚至未公布7人姓名。官方草草封存事故期间相关批次食品，象征性地免除7月水费了事。这一系列操作，可谓“喝进去有毒、说出来有罪”：让民众吞下有毒污水几乎不需付出代价，但若胆敢喊出一句不满就会被治罪。



官僚资本与修正统治：事故背后的系统性漠视
杭州“粪水”事故绝非偶发的技术纰漏，而是官僚资本、地方政府与企业相互勾结的必然恶果。余杭区水务公司作为地方国企，本应保障饮水安全，却在事故前长期疏于监管。有媒体揭露，事发前数月余杭区水源监测报告早已显示粪大肠菌群指数暴涨超标，5月份数据明显异常。大肠菌群是粪便污染指标，这意味着相关部门对水源粪污隐患早有察觉却听之任之。最终臭气熏天的脏水大摇大摆流入千家万户，才令问题暴露。事故发生后，当局第一反应不是迅速救民于水火、追查企业失职责任，而是忙于灭声辟谣，试图证明居民家中流出的“不是屎尿”，并恫吓质疑者闭嘴。这正是修正主义统治逻辑下的典型官场现形：为了维稳和颜面，可以不惜牺牲人民的知情权和健康权。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那些让老百姓“吃屎”的政府管理者之所以肆无忌惮，正因为他们几乎不用为此承担代价。区区5吨水费减免不过羞辱性地折射出权贵对平民生命的漠视——当人民的尊严与安全遭到践踏，这个体制关心的只是如何花最小代价敷衍过去。

透视这一事件，可以看到资本逻辑对人民利益的系统性凌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号称“人民当家作主”，实则资本势力和权贵集团勾连坐大，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些“红顶商人”挂着国企招牌或官员头衔，干的却是以权谋私、与资本合谋压榨人民的勾当。他们打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行的却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对内帝国主义之实。外表冠冕堂皇，内部尽是剥削与压迫。在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统治秩序下，人民群众的福祉安全被视为可牺牲的成本，而权力与资本的利益勾结则被精心维护。从毒奶粉、地沟油，到矿难瞒报、疫苗造假，无不如此：只要不出大乱子，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事就推诿遮掩、找个替罪羊平息风波。正如毛主席早在五六十年前警示我们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这些混进党政机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掌权，就必然要使无产阶级政权变色，为特权阶级谋私服务。杭州供水事故背后，我们再次见证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一论断的现实写照：一小撮官僚资本势力高居庙堂，贪腐失职，却让无辜群众吞下苦果。

生态灾难的缩影：资本主义复辟下的全面危机
值得警惕的是，杭州这场严重危及人民生命健康的生态灾难绝非孤例，而是当今中国社会矛盾全面爆发的一个缩影。中国的高速发展早已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饮鸩止渴”，“粪水事件”正是这种畸形发展模式结出的恶果。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就会发现类似的环境、公害事件在各地层出不穷、早已“遍地开花”：

- 食品与水源污染：从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到上海黄浦江畔数以千计死猪漂浮污染饮用水，再到甘肃天水幼儿园群体铅中毒……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案例揭示出企业逐利和监管失守给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杭州自来水恶臭只是最新一例严重公共卫生事故，其本质与毒奶粉、毒疫苗等如出一辙：资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偷工减料、排污超标，而地方官员为保GDP和乌纱帽选择性失明，最终牺牲的是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
- 基础设施危机：杭州作为经济发达城市，竟出现自来水管网“粪水横流”，暴露城市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失修。据报道，余杭区部分供水管道服役已久，年久失修导致管道渗漏、雨污混接等问题，一旦上游水源出现污染物就可能倒灌入自来水系统。这背后映射出各地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和管理失当：一些地方政府醉心于形象工程和房地产开发，却忽视供水、排污等民生设施的更新维护。官僚资本热衷于跑马圈地赚快钱，对长远的公共安全投入则能省则省。这种短视行为埋下无数定时炸弹，一遇气候异常或意外状况就可能引爆成灾。
- 工业污染与公害：改革以来沿海地区工业化、高耗能企业密集，造成长期的环境积累性污染。据内部数据，中国95%以上的地下水和75%的地表水已受污染，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严重。杭州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周边化工、印染、冶炼等行业发达，对水源的慢性侵蚀从未停止。表面歌舞升平的繁荣都市，暗流着看不见的生态危机。当饮用水源头早已遭受工业废水和养殖排泄物污染，而负责净化的水厂却疏于技术升级、偷工减料，那么小小一个高温“藻类潮”就足以引爆链条断裂，酿成供水大崩溃。



转移矛盾的民族主义烟幕：《南京照相馆》与仇恨宣传
在杭州供水危机引发公愤的同时，当局迅速祭出了民族主义的宣传烟幕，企图将公众视线从现实民生转移开来。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对主旋律电影《南京照相馆》的高调炒作与鼓动。

这部取材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战争影片于2025年暑期在全国公映，官方媒体大力宣传其“爱国主义”内涵，上映短短八天票房便突破10亿元人民币。影片讲述1937年南京沦陷期间，一家照相馆学徒冒死保留侵华日军暴行照片，为战后审判提供证据的故事。上映后，央视等官媒连连发文赞颂：“88年前日本侵略者屠杀我30万同胞的真相，终于通过电影揭示！”并鼓动全社会“铭记历史，不忘仇恨”。各地学校和家长也纷纷组织青少年观影，号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在官方煽动下，这部影片迅速掀起了一股极端民族情绪。据报导，一些年幼的孩子在看完电影后表现出强烈的仇恨反应：有9岁男孩回家撕毁了自己珍藏的日本奥特曼漫画，声称要抵制一切日本文化；一位年轻母亲更是在影院散场时教导女儿“要杀光日本人”，问孩子“现在知道日本人多残忍了吧？”，小女孩吓得哭喊：“知道了！”。此类场景的传播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巨大波澜。人民日报、新华社一开始津津乐道这些充满仇恨的“爱国举动”，但意识到争议后又悄然删去了相关视频。然而民间对“仇恨教育”的质疑已经引发讨论。不少理性的网民指出：牢记历史是为了珍视和平、防止悲剧重演，绝不是为了挑动新仇旧恨。甚至有良心人士批评道：某些媒体在利用儿童的纯真作为工具，以“种族仇恨”博取眼球，这无疑是在毒化下一代的心灵。

面对民间谨慎的批评，中共官方喉舌迅速反扑，进一步坐实了其利用民族主义转移矛盾的企图。《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痛骂质疑影片的人是在“污蔑历史纪念、搞仇恨教育”的帽子。这家极端民族主义报纸颂扬《南京照相馆》是“重要的反种族主义艺术作品”，宣称它“突破了宽恕侵略者的套路”，理直气壮地为煽动仇恨辩护。紧接着，中国和日本国内相继出现疑似报复性的暴力事件：在苏州有日本籍母子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在东京也传出中国留学生被殴打的消息。民族敌对情绪被推向新高，而官方媒体对此轻描淡写，继续号召民众将愤怒指向历史上的日本侵略者和当今国外“反华势力”。

这一幕幕与杭州“粪水”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并置对比：一边是现实中数十万群众饮水受毒、利益受损，却被要求沉默忍耐；另一边是银幕上仇日情绪高涨，群众被鼓动去痛恨80多年前的侵略者。统治当局正是希望通过渲染“历史仇恨”来稀释当下的不满，把人民的注意力从眼前的阶级压迫转移到抽象的民族仇敌身上。马列毛主义者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这种病态的宣传显露出统治阶级黔驴技穷之下的最后一招：紧抓民族主义这根救命稻草来挽救其岌岌可危的凝聚力，掩盖其反动剥削带来的恶果。他们一方面煽动民众对外仇恨以转嫁矛盾，另一方面又偷梁换柱地把真正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阉割、庸俗化，妄图用扭曲的“爱国主义”来蒙蔽群众。然而再华丽的民族叙事也掩盖不了体制内在的腐朽和危机。当局高喊“团结一致对外”，鼓吹“为了打败共同敌人，民族内部应联合起来”，实质是要无产阶级吞下更多剥削，替本国资产阶级卖命，在国际资本竞争中充当炮灰。这样的把戏充分说明：民族主义话语已成为中修（中国修正主义当局）用以压迫工农、转移视线的工具。正如文章所揭示的：“当下赵国（指中国）社会，河蟹（执政党）为发展资本主义，必须阶级调和，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由此可见，民族叙事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之深”。

简而言之，官僚资产阶级一手制造民生灾难，一手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对于杭州人民而言，他们真正的敌人难道是远在海外的日本军国主义残影吗？让他们喝臭水、吞苦果的刽子手，不正是眼前这些身着共产党外衣、实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官老爷们吗？当局大肆宣传《南京照相馆》，无非是想让群众愤怒的矛头指向昔日侵略者和外国资本，而不去追究今日国内权贵资本对自己的残酷压迫。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套路：用历史仇恨麻痹人民、转移斗争对象，从而继续巩固国内反动统治。

认清真敌人，走群众斗争与造反之路

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不在于当局所鼓吹的民族主义狂热，而在于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彻底埋葬造成万般苦难的反动统治秩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拨开宣传迷雾，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正如毛主席所反复强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敌友——在当代中国，真正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和幸福生活的，不是外国资本或历史幽灵，而是盘踞在执政党和国家机器内部的资产阶级。这些党内走资派、官僚资本家才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打着人民政府的旗号享受特权、疯狂敛财，却对人民的死活漠不关心。在杭州供水事件中，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他们决不会认真处理；而一旦群众起来维权，他们立刻祭出高压手段和虚假叙事以镇压和欺骗。这充分说明：中国老百姓所遭遇的一切剥削压迫，根源在于党内资产阶级上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因此我们的斗争绝不能被民族主义假象所误导。日本军国主义虽然罪恶滔天，但那是前辈们早已打倒的敌人；而今天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资本残余和官僚资本主义，正主要以“修正主义当局”的面目出现。所谓“爱国”绝不等于爱朝廷。我们真正要捍卫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真正应当打倒的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资产阶级，无论它是西方帝国主义还是本国的官僚买办。

其次，我们必须坚信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观现实，当局漠视群众疾苦，甚至不惜让群众“吃屎”受辱来保全自己的面子。而真正的人民领袖应当像毛主席那样，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1944年延安时期，毛主席听闻陕北一个村庄许多妇女多年不孕，立刻怀疑饮水有问题，亲自下令医院派人检验水质，果然发现水源有害物质超标；随后组织解决水质并治疗患者，最终当地重新传出婴儿啼哭声。这一细节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也与当今修正主义官僚对杭州百姓中毒供水的不管不顾形成天壤之别。我们要重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当局不作为，我们就自己组织起来作为！面对有毒的水，我们可以自发维权、取样检测；面对官方的谎言，我们可以利用网络揭露真相、传播群众的声音；面对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我们可以成立独立的群众监督组织，督促整改或自行采取保护行动。总之，不能指望骑在头上的剥削者良心发现，只有发动群众的力量，才能保障群众的利益。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我们号召广大工农群众拿起马列毛主义的武器，走上群众斗争与革命造反之路。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当统治阶级把我们逼到饮用粪水的绝境，当和平请愿换来的只是沉默和镇压，我们就有权利也有必要用更激进的方式捍卫生存尊严。所谓群众斗争，并不只是消极的抗议，而应当是有组织、有纲领的集体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工人阶级发动罢工捍卫劳动与健康权益、居民社区建立自治互助组织保障基本生活、进步青年踊跃揭露社会黑暗真相、左翼力量团结起来宣传革命真理等等。在斗争中提高群众觉悟，在斗争中打破恐惧枷锁，在斗争中瓦解统治阶级的神话，这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必由之路。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号召：

- 认清阶级敌人，打破民族主义迷梦：时刻警惕统治者利用民族矛盾为麻醉剂，不要把仇恨浪费在假想的外敌上。正如革命导师所言，我们的主要敌人就在中国，在统治阶级内部。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旧账挂在今天中国人民的账上，无非是当局转嫁矛盾的策略。我们绝不给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战车充当炮灰！相反，要把矛头坚定对准国内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 争取舆论阵地，揭露官方谎言：利用一切可行渠道传播杭州事件的真相，揭穿所谓“藻类污染”“谣言止于智者”等谬论。我们要大声质问：是谁让数十万人民饮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是谁在事故前隐瞒预警数据酿成大祸？是谁在事后封口打压公民调查？把真相公之于众，就是对修正主义统治最有力的抨击。让更多群众明白，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人民的错，而是统治阶级的罪！
- 开展阶级互助，积蓄革命力量：面对官僚资本的压迫，群众只能依靠群众自己。我们应当恢复和发扬阶级互助精神，比如组建志愿小组为受污染居民送水、集资购买净水设备、法律援助受害者索赔等。在共同斗争中，工农大众将看到团结的力量，也将认清改良幻想的不切实际。随着斗争的深入，应逐步形成独立的工人协会、农民协会、街坊自治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谈得上有领导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政治抗争。
- 直面反动镇压，坚持革命路线：统治阶级绝不会坐视人民觉醒而无动于衷。正如杭州事件中他们动用公安威胁“造谣”者一样，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会招致更严酷的镇压。但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要有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以游击战术与策略躲避其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在适当时机，集中群众愤怒，给予反动当局以迎头痛击。我们相信，一旦革命时机成熟，千百万受压迫群众将响应号召，共同埋葬这个反动腐朽的修正主义政权，重建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新中国。

今天的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关头。一方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日益加深，人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已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反抗也在各条战线蓬勃兴起。杭州“粪水”事件不过是压垮人民忍耐极限的又一根稻草，亿万劳动者心中对不公和腐败的怒火早已点燃。我们的使命，正是要将这零散的怒火汇聚成燎原的革命烈焰。当人民认清真正的敌人，拒绝再为虚假的民族大义吞声，当千千万万群众以自己的组织和斗争向统治者说“不”，那一天就将标志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让帝国主义走狗和修正主义叛徒发抖去吧！正如革命歌曲所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人民的觉醒不可逆转。让我们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坚定地走群众路线，投入伟大的阶级斗争洪流，用行动证明——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最终，压迫人民的腐朽统治必将被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迎来真正属于人民的解放与新生！



评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

2023年武汉大学图书馆自习室内发生一起引发全国关注的性骚扰风波。武汉大学女研究生杨某某在社交媒体发文举报对面自习的男生肖某某“性骚扰”，称其持续在桌下摩擦下体。校方迅速介入调查并在两日内给予肖某某记过处分，但未明确说明其违纪细节。肖某某坚决否认骚扰意图，解释自己因皮肤病湿疹复发隔衣抓痒，却被误解为不雅行为。此后杨某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肖某某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2025年7月25日，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以证明性骚扰成立，驳回了杨某全部诉求。这一结果令事件出现反转，引发了公众对于高校性骚扰举报机制、诬告责任和网络暴力的广泛讨论。在这场风波中，涉事双方身心俱疲：男生因网络舆论压力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度有轻生念头；女生则被指责“诬告”遭遇网暴。本应维护正义的反性骚扰行动为何演变为两败俱伤的闹剧？本文试从马列毛主义视角深入剖析此事件，揭示高校封闭等级制度和官僚文化对女性学生的压迫根源，批判脱离阶级的极端女权思潮，阐明唯有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治为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并号召广大群众团结斗争，既勇于对不公维权又警惕以“女权”之名制造的群众分裂。



高校等级体制与官僚文化：性骚扰的制度性土壤
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表面上是学生个体间的是非纠纷，深层次却折射出高校内部封闭的等级体制和官僚主义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伤害。长期以来，中国高校沿袭着自上而下的科层结构，行政权力高度集中，师生地位悬殊。这种封闭的等级制度滋生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对弱势群体（包括女学生）的正当诉求常常缺乏敏感和响应，甚至可能助长性骚扰等侵害行为的发生与隐蔽。正如有评论指出，近年曝光的高校性骚扰、性侵案件只是高校黑暗的冰山一角，背后往往伴随官僚主义、裙带关系、学术腐败、以权谋私、权力倾轧等深层问题，而且几乎每所高校都有类似现象。

换言之，性骚扰之所以在高校屡禁不绝，不是孤立的道德问题，而是滋生于一个高度集权且缺乏监督的官僚体系和等级文化。在这种环境下，掌权者（无论是导师、官员抑或学生干部）往往对下拥有过大支配权，导致某些男性利用职权对女学生进行骚扰或压迫，而受害女性由于地位劣势和制度壁垒，维权之路格外艰难。武大事件中，虽然加害人和受害人同为学生，但同样体现了制度对女性的不公和压迫。首先，校方最初对杨某的举报反应迟缓且态度暧昧。根据事后调查，校方在调取监控后曾认为证据不足，却无意公开透明处理，反而有劝私下和解的倾向。杨某感觉学校并未真正站在受害者一边，再加上对方是“本地有权有势”家庭，她担心如果走常规程序，自己的个人信息会被公开曝光，反而遭受报复。这种不信任正说明了高校内部缺乏令学生信赖的申诉渠道和保护机制——女性学生面对权力体系时，天然处于劣势，往往不得不“逼上梁山”，采取网络曝光等非常手段。杨某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举报，正是对校内官僚系统失望后的选择。然而，校方在舆论压力下两天内仓促对肖某某记过处分，又显得草率武断，缺乏依法依规的严谨。这种先斩后奏的处理方式，凸显高校管理中形式大于实质、维稳重于公正的官僚主义习气。最终，当司法判决推翻校纪处分后，武大却迟迟未撤销对肖某的处分决定，引发舆论质疑其纠错诚意。由此可见，封闭的高校层级和官僚文化一方面可能使真正的性骚扰得不到及时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可能为了平息舆情而牺牲程序正义，导致冤假错案。无论哪种情形，受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女学生等弱势者：要么遭受性侵害投诉无门，要么在混乱的处理中过度卷入舆论漩涡。



更广泛地看，国内近年屡曝导师教授对女学生的骚扰侵害案，从北航陈小武案到人大王贵元案，无不反映高校权力结构对女性的压迫。人民大学王贵元性骚扰女博士生事件中，当事女生曾向校方举报达两年之久未获公正处理，直到网络实名曝光引起轩然大波，校方才不得不闪电调查并开除涉事教授，将案件移送警方。这一过程再次验证，在等级森严、声誉至上的高校官场，女性要伸张正义往往举步维艰。如果没有舆论和群众的介入，多少校园性侵害案会被私下压下、多少加害者会逍遥法外？性骚扰行为之所以屡屡发生、屡屡遮掩，正是因为现行体制赋予了掌权者过大的话语权和保护伞。有高校领导甚至坦言名校并非净土，某副校长直言“如果你不想你的女儿被那些教授老头强奸，就不要送来读博士”——这番话既是对当下高校权力生态的揭露，更道出了女性在学术权力场中被物化和侵害的普遍风险。在这种黑暗现实下，将武大图书馆事件仅归结为个体误会或品行问题，无异于隔靴搔痒。我们必须认清：高校中的性骚扰问题源自制度性的压迫土壤，只有铲除封闭僵化的等级特权和官僚主义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对女性的侵害。

阶级视角下对“极端女权主义”的冷静批判

武大事件掀起的滔天舆情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网上日渐盛行的某些“极端女权主义”话语。部分自称女权的声音，将此类事件简单化为男性对女性的普遍压迫，主张无条件地“信女不信男”，对男性群体口诛笔伐，甚至把所有男性都视作潜在加害者。这种思潮在中文互联网上被调侃为“女拳主义”（意即挥舞女权之拳），其特点是否认一切阶级矛盾、将性别对立夸张到绝对优先的位置。不可否认，女权主义理论本应关注性别不平等，但当这种关注被极端化、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经济背景时，就走偏为一种狭隘的身份政治，既无法真正解放广大女性，反而可能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沦为分化群众的工具。

从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出发，我们有必要对当前流行的极端女权倾向予以批判。首先，需要明确妇女问题从根本上也是一个阶级问题。不顾阶级差异、单纯以性别划线的的女权论调，往往代表着小资产阶级或自由主义精英女性的利益诉求，而与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妇女的现实困境相去甚远。有左翼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阶级分析可以发现，“极端女权”实际上只代表了少数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利益；广大劳动妇女才是争取女性平权的主要对象，我们更应关注后者的解放，而不是被那少数吵闹的极端女权所牵着鼻子走。



事实也是如此：网络上声音最大的所谓女权人士，多为都市中产或受过高等教育者，她们热衷讨论职场天花板、饭圈骚扰、男性原罪等话题，却很少触及女工在工厂遭受的超时剥削、农村留守妇女面对的贫困歧视等底层议题。这种脱离工农姐妹的精英女权，看似激进尖锐，实则眼界狭隘，格局有限。其诉求无非是希望在现存体制内让少数女性跻身精英行列，分享资产阶级男性的特权，而对压迫女性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阶级剥削缺乏触动。正如论者所批评的，这种资产阶级女权主义高举“废除父权制”之旗，却出于自身阶级利益不敢触及父权制的根基——私有制。它表面上有一定进步性，但更多体现的是基于私有制之上的个人主义和自私。一旦这种女权主张部分实现，“解放”的只是那一小撮资产阶级女性；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女性不仅仍将在家庭中受父权制压迫，更将继续饱受资产阶级男性和女性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可见，脱离了阶级视角的极端女权不可能带来广大女性的彻底解放，充其量只是替一小撮既得利益者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



更严重的是，极端女权狭隘仇视全体男性的言论，不但没有识别出真正压迫女性的敌人（资本和反动制度），反而会客观上制造性别对立、瓦解人民内部的团结。在武大事件中，我们看到网络上支持杨某的和同情肖某的人互相攻讦，舆论一度从关注事件真相和制度责任，变成了情绪化的“性别大战”。一些激进女权分子将男性集体妖魔化，把个案上升为“两性天然对立”，结果诱发了不少男性网民的反弹仇视，甚至对女性正当维权产生抵触。这种两败俱伤的舆论内耗，正中那些真正作恶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下怀。有分析指出，在某些类似案件中，女性在网上发出“小作文”引发共情狂潮，往往让舆论一边倒地谴责男性当事人，即使证据不足也导致男方名誉尽毁、前途受损。然而这类“舆论审判”真的提高了普通女性的权利地位吗？并没有。事实上，每当极端女权把矛头对准普通男性、煽动网络声讨时，直接得利的往往是控制媒体话语的小资产阶级和借机炒作的当事人。她们一边将男女对立情绪推向极致，一边借流量营销敛财；而更长远的后果则是搬起石头砸了广大女性的脚：许多企业老板为了避免麻烦，可能更不愿雇佣女员工；普通男性因为害怕被诬陷，开始疏远女性同学同事；社会上弥漫的不信任感最终令正常的两性合作更困难，女性在就业和社会生活中的处境反而更趋弱势。与此同时，真正位高权重的资本家和官僚却乐见其成：他们成功地把大众的视线从阶级剥削转移到性别仇恨，让底层男女自相残杀，而资产阶级稳坐钓鱼台，继续巩固统治。极端女权鼓吹的性别仇视实际上充当了转移矛盾的烟幕弹——社会底层男女本应联合向上的愤怒，被巧妙地横向引爆为彼此攻击，这无疑削弱了无产阶级整体的斗争力量，为资产阶级维持既有压迫秩序立下了“奇功”。

所以，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地区分真正争取妇女解放的进步力量和被资产阶级利用的极端女权歧途。真正的女性解放运动决非针对全体男性的战争，而是广大受压迫女性和男性携手反对压迫者的战争。毛主席早就指出过，中国的男人要摆脱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中国女人除了承受这“三座大山”之外还额外受男子的支配（夫权）的压迫。也就是说，妇女解放有其特殊性，但绝不能脱离普遍的阶级解放。那些鼓吹“女性优先于阶级”“仇视一切男人”的极端女权论者，其言行看似激烈，实则背离了工农女性群众，客观上服务于小资产阶级个人利益或西式自由派精英的议程。这种思潮不仅无法真正解决女性所遭受的阶级压迫、种族压迫，更可能沦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和瓦解群众斗争的一把利刃。对于这类极端女权主义，我们应当提高警惕、坚决批判。女性的敌人从来不是作为个体的普通男人，而是压在男女劳动大众头上的反动体制和剥削阶级。当极端女权偏离了这一点，也就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是每一个真正关心妇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人需要看清的真相。

毛泽东思想与女性解放：唯有阶级斗争之路

面对高校性骚扰等女性受压迫现象，以及当下女权 discourse 的乱象，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毛泽东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导师，始终将妇女解放视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明确提出：

“妇女解放必须与劳动解放相结合，没有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妇女的彻底解放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妇女问题与阶级解放、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没有整个社会的进步和无产阶级的解放，就不可能有全体女性真正的解放。同样，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指出：“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是消灭剥削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这一历史进程不仅解放了工农大众，也为实现男女平等创造了根本条件。相反，在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存在的社会里，男女平等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或局部领域，广大劳动妇女仍要遭受来自资本和父权的双重桎梏。

毛泽东思想一贯强调，妇女问题的本质是社会的生产关系问题。他曾一语道破：“妇女问题本质上是生产关系问题，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说，只有推翻旧的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制度，才能连根拔除滋生性别不平等的土壤，进而实现全人类包括女性在内的彻底解放。这一论断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高度契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论证，男女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生，妇女在经济上对男子的依赖是其从属性的根源。因此，要消灭这种不平等，必须废除造成妇女经济依附的私有制制度。毛主席正是将这一理论成功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妇女地位得到历史性提升——封建婚姻制度被摧毁，妇女获得参政权、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原则，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进步。更为关键的是，毛主席始终倡导妇女要在革命和建设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他著名地指出“妇女能顶半边天”、“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这些论断既是对女性力量的高度肯定，也表明了女性解放必须依靠女性自觉的群众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妇女的支持和参与：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妇女赤卫队，到抗日战争中的妇救会、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各条战线，女性为民族解放和社会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毛泽东强调“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支力量”。这提示我们：女性不是等待被解放的对象，而是革命运动的主体之一。只有当被压迫的妇女自己组织起来、觉悟起来，投身于推翻旧世界的伟大斗争，她们的解放才有可靠的保障。

由此可见，真正的妇女解放道路只能是融入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道路。当今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残余和新形式仍然存在，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也层出不穷。解决这些问题，绝非靠西方式的身份政治或精英女性的一己奋斗能够实现，而要靠继承毛泽东思想，走群众路线，在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继续推进男女平等。无产阶级的女性解放观要求广大妇女与本阶级的男子兄弟并肩作战。有研究者概括道：无产阶级女性深知自身解放与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牢牢绑定，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要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以及无产阶级妇女与资产阶级妇女的共同解放，唯一出路就是团结无产阶级男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把资本主义、父权制及其根源私有制一起埋葬。这段话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对于劳动妇女而言，男性并非天生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同属被剥削阶级的男性是并肩战斗的同志，只有团结自己的“异性兄弟”，才能推翻使男女都受苦的旧制度。历史已经证明，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千百万男女战友之间结下的钢铁情谊，远比那种建立在狭隘性别意识基础上的“姐妹情谊”更加巩固而深厚。工农女性只有站在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上，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男性同志，才能形成摧毁旧世界的磅礴伟力，迎来妇女翻身得解放的新天地。

团结斗争与警惕分化：走向真正的男女平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在呼吁女性站起来向压迫奋战的同时，也要警惕有人打着“女权”的旗号在群众内部煽动对立。高校性骚扰事件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是：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必须与广大群众的共同斗争相结合，而不能以对立群众、制造性别分裂为代价。当女学生遭遇性骚扰时，我们当然要坚决声援受害者、追究加害者和庇护者的责任；当校方或权势人物试图压案时，我们更要发动舆论和法律武器，迫使官僚体系低头。在这一点上，武大事件也好，人大导师性侵案也好，都体现了舆论监督和群众压力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每一个沉冤得雪的案件背后，都离不开正义群众的声张。然而，我们同时看到，如果斗争方式不当、矛头不准，偏离了人民内部团结的大方向，就可能落入“没有胜利者”的困境。极端女权主义鼓吹的性别战争，已经被现实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歧路：它让真正的女权运动背负恶名，也让许多原本同情妇女遭遇的男性群众心生疏离。到头来，既损害了女性利益，也削弱了人民斗争整体的力量。

因此，我们主张的女性解放之路，是一条男女群众大联合、共同对准剥削压迫者的道路。对于高校里的性骚扰、职场中的性别歧视、社会上的侵害妇女权益现象，女性和男性劳动者完全可以也应该携起手来，一道向学校当局、资本雇主和司法机关坚定地问责。女性的权益保障，从来都离不开男性同志的支持配合；同样，男性的解放也离不开女性同志的参与。正如毛主席所说，

“我们革命胜利的把握，来自于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在性骚扰这样的议题上，女性的真正敌人不是泛指所有男性，而是那些利用特权实施侵害的败类，以及放任包庇他们的体制。男性学生和工友们理应认识到，打击校园和社会中的色狼恶霸，既是维护女性姐妹的权利，也是净化自身生活环境、铲除特权势力的需要。这是全体劳动人民共同的斗争，而非女性对男性的片面对抗。

我们也要谨防某些别有用心者借女权之名行分裂群众之实。当前，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势力都善于利用社会议题挑拨离间群众。有的打着“关怀女性”的幌子，鼓吹“男性原罪论”来激化矛盾；有的打着“保护男性”的旗号，攻击一切女权主张以维护父权制。对于这些现象，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曾有左翼评论总结道：极端女权主义如今在资产阶级的利用和扭曲下，逐渐变成了一个压迫底层男性、为小资产阶级牟利、分化无产阶级力量、帮助资产阶级转移矛盾和维持统治的工具^b。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对此提高警觉，必要时把这种思潮当作敌对势力加以批判，同时积极争取那些受误导但有正义感的普通女性，让她们明白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劳动人民的男性伙伴。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仇恨宣传，也反对以“女权”之名行打击进步力量之实的行为。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毛泽东历来倡导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特别是依靠占妇女大多数的工农群众，而不是靠少数精英代言。任何脱离人民、充满精英傲慢和仇恨思维的所谓“女权运动”，都不可能真正成功。

最后，我们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妇女解放的事业重新拉回到正确的航道上。真正的女权主义应当是人民大众的女权、无产阶级的女权，是主张男女劳动者联合起来砸碎一切压迫枷锁的革命女权。只有在这样的女权指引下，我们才能避免无谓的内耗分裂，将更多精力投入同共同敌人的斗争。回顾历史，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世界革命，妇女解放运动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紧密相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依然要把握这个根本点。

让我们团结起来：女学生要为了姐妹们不再遭受骚扰侵害而勇敢发声，男学生要做支持正义的同盟军一起向校方不作为问责；女工们要为平等的劳动权益奋起抗争，男工友就站在旁边撑腰助威；全国男女劳动群众肩并肩，向着那高踞头顶的资本和官僚特权开火！当千百万劳动妇女和劳动男子真正团结成钢铁长城，没有任何腐朽势力能够阻挡他们争取解放的步伐。我们深信：只有坚持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每一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普通人，不论性别，都将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正如毛主席所期望的那样，全国妇女和全体人民一道奋起之日，必将是压迫者土崩瓦解之时，也是新社会朝阳普照之际！

修正主义还是宗派主义？

——对“共产主义者”网站的批判

摘要：本文从坚定的马列毛主义立场出发，系统批判“共产主义者”

（BolshevikLeninists.com）网站所宣扬思想和路线，揭露其打着“革命”旗号散布修正主义观点、实行宗派主义分裂革命队伍的实质。文章从理论体系、政治立场、历史观、国际主义路线、统一战线策略和组织路线等方面逐一剖析该网站文章中的谬误。我们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完全演变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该网站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战略和国际路线等问题上的理解要么模糊动摇，要么根本错位。本文通过引用该网站原文并逐条驳斥，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警示革命同志认清“共产主义者”网站披着革命外衣的伪托派（假托洛茨基主义）本质，以及其宗派主义实践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理论体系：反对教条还是折中机会？

“共产主义者”网站在其宗旨中反复声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某人之派’”，自诩打破教条、反对宗派标签。他们强调不能以某个人物的名字来概括自己的思想，宣称不会把任何革命导师奉为偶像，也不会简单划分历史人物为绝对的好人或坏人。他们倡导一种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观，主张从具体斗争出发，综合运用整个革命思想宝库，而不拘泥于某一流派。表面上看，这种姿态似乎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然而，究其实际，这种“不属任何派”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折中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体现。



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历史上的托洛茨基。（1）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各个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并非可有可无的“标签”，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科学总结。坚持马列毛主义，并不是盲目崇拜某个人，而是坚持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指导革命实践。该网站否定明确的思想旗帜，鼓吹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托洛茨基、葛兰西等所有革命导师的思想揉成一锅“大杂烩”。他们声称这样才能“结合当前条件解决现实问题”，避免视野受限。但在实践中，这种不加区分的“综合”，恰恰抹杀了革命理论中的原则界限，模糊了真理与谬误的界线。

例如，该网站明明大量引用和肯定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却又在读者质疑他们是不是“托派”时矢口否认，称“不要用闻味道的方法主观几秒钟判断一个组织”。他们抱怨一些同志给他们扣上“托派”的帽子是宗派成见。但事实上，从他们的理论倾向和历史评判来看，正是深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只不过他们为了避免在中国左翼中引起反感，故意淡化自己的托派色彩，把一切说成是对“革命传统整体”的继承。这种做法不仅不光明正大，而且反映了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为了迎合不同读者而刻意模糊自己的思想本质。真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讳言自己所坚持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早就指出：“路线就是一切”。在革命理论上打模糊仗，否认自己路线的来源和归属，其结果只能是丧失原则。

其次，该网站鼓吹的“实践唯物主义”言必称灵活务实，实则暗含对基本革命原则的退却。他们列举一系列他们反对的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学院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当然值得反对。然而，他们对托洛茨基主义却采取了暧昧态度：一方面写文章“评析托洛茨基主义”，承认其“历史意义和局限”；但另一方面又极力为托洛茨基辩护，称其早年错误是“诚实的”，后来也认识到了列宁的正确。更有甚者，他们为托派在历史上的作用大唱赞歌，声称托派曾在德、西等国工人运动中发挥革命作用，“反对阶级妥协、主张激进斗争”曾激励工人。所有这些论调，充分暴露出他们对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抱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和推崇。

众所周知，托洛茨基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了托派路线的破产：20世纪20年代，托派拒绝国共合作反帝，结果孤立无援；30年代托派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沦为历史尘埃。然而“共产主义者”网站对此只字不提，反而指责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策略失误断送革命，完全采取了托派对历史的叙事。他们甚至把中共1927年失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斯大林集团的叛卖”（把蒋介石的背叛说成是共产国际的错），替托派当年的主张张目。这种历史观实质上是否定了中国革命自身探索出的正确道路，而认同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责。

总之，该网站宣称的“反宗派、去教条”实为伪装。他们不愿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实为不愿严格遵循这一革命科学的原则和路线；他们不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需要明确批判的错误思潮，反而加以美化，实为在思想上掺杂托派的修正主义成分。这种看似折衷调和、兼收并蓄的理论姿态，正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以“灵活”之名，行篡改和放弃革命原则之实。

政治立场：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道路

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坚定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以阶级和生产方式的分析来认识当代中国。毛泽东逝世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时至今日，已经发展成为垄断资本统治、对内残酷剥削工人农民、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新兴帝国主义强国。这一点在国际马列毛主义运动中早有定论。然而，“共产主义者”网站对这一基本判断最初并未鲜明指出，以至于有读者在别的网站上提出质疑，问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是否已具有帝国主义性质。面对质疑，该网站才在一篇Q&A性质的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回答中承认中国已经达到帝国主义阶段，并给出了列宁主义定义框架下的分析：



“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高度生产集中和垄断、工业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寡头将国内市场瓜分完毕而不得不转向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市场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呢？我们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若干特征并与此对比，就可以得到肯定的结论。”他们指出，中国资本主义不再处于自由竞争的工业化上升阶段，国内市场已近饱和，寡头垄断形成，因此“目光不可避免地望向世界市场”，与其他帝国主义冲突在所难免。这些论述表面看是对中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认定。然而，该网站紧接着话锋一转，又强调“帝国主义阶段”只是一般概括，当代中国有许多不同于经典帝国主义的新特征，不能生搬硬套列宁时代的经验来预测今天。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已是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以“新的特征”“不要刻舟求剑”等语给这一判断加上种种但书和保留。这种表述给人的印象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一个真正坚定的革命派，应该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就是帝国主义国家，是当今国际垄断资本体系中的一员强盗。对此，不需要吞吞吐吐。

关于真理报：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马列毛主义组织，于2024年7月4日在浙江杭州成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组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我们的官网：

<https://rcpconline.com/>

我们的纸飞机频道：

<https://t.me/CPCMarxismLeninism>

有意向者可通过官网来申请加入我们（一旦审核通过，便会成为我们的成员）或者订阅我们的杂志

投稿邮箱：cpcmlofficial@gmail.com

联系邮箱：CPCMLOfficial@proton.me

“共产主义者”网站直到被质疑才正面回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本身就说明他们没有把这一关系中国革命战略的根本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在承认中国帝国主义性质时又过度强调“与旧帝国主义有所不同”，似有为当局开脱或降低警惕之嫌。列宁早就教导我们：“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如果确认中国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那么中华民族不再是半殖民地被迫民族，而是压迫别国的帝国主义民族，这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应直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该网站虽然承认帝国主义性质，却没有进一步提出与之相应的革命策略转变，反而在措辞上遮遮掩掩，让人怀疑其政治立场的坚定性。

相较之下，中国的毛派革命者和国际上一切马列毛主义组织早已直斥今日中国为“社会帝国主义”。所谓“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更具欺骗性和危险性，因为它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行扩张剥削之实。目前中国资本输出遍及非洲、拉美、亚洲，一带一路就是对外争夺的帝国主义战略；国内则形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权的社会法西斯统治——政治上极权高压，经济上资本主义剥削。这些基本判断在“共产主义者”网站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到。他们虽然提到中国政府如沙皇般专制、禁止工人组织，却未点明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形态。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危机下当局鼓吹“内循环”等迷雾，却没有揭露出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本身就是造成中国社会一切灾难的总根源。简言之，该网站对中国阶级专政的本质和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本质缺乏深刻揭露，满足于一般化的表面批判。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起公开为特色党涂脂抹粉的赤裸裸修正主义者当然要进步一些，但相较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批判火力显然弱得多、软得多。

模糊革命性质与道路

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摇摆，“共产主义者”网站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阐述也不够明确坚定。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在一个帝国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大国，无产阶级革命应当直接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目标，没有所谓“二阶段革命”的问题。但革命的具体道路需要结合国情：毛泽东在半殖民地中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道路，而在当代高度城市化的中国，革命战略需要创新，但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统一战线、人民战争等基本原则，不可能靠和平改良或自发斗争成功。



该网站一方面也强调要建立“革命先锋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这看似与列宁主义一致。他们批评目前中国左翼“分散割裂、一盘散沙”，主张打造严密的地下组织网络，坚持民主集中制传统。他们号召每位同志都走出舒适圈，在各处发展外围组织、传播革命火种，而不仅做“网左”键盘侠。这些表面上听起来很积极。然而，我们要透过表象看本质：他们为中国革命设想的道路，是否真正切合中国现实并体现马列毛主义原则？

首先，他们高度强调城市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却几乎忽视了对农村和农民的工作。在长篇的纲领叙述中，我们很难找到有关农民问题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具体论述。他们谈到“中国需要且只需要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将领导中国工人、学生，以及被团结在工人周围的农民和一部分进步小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句话点了“农民”的名，但仅仅一笔带过，缺乏进一步详述。毛泽东指出：“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在半殖民地旧中国如此，在今天依然如此。即使经过改革开放的工业化，今日中国仍有几亿农民工和农村人口遭受资本主义压迫。如果革命策略中没有将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清晰方略，而仅空喊“工人领导农民”，很可能流于纸上谈兵。托洛茨基主义者历史上轻视农民力量、幻想单纯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迅速起义夺权，这是酿成多次失败的原因之一。“共产主义者”网站在策略上是否走上了托派的老路？这一点值得警惕。

其次，他们对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的态度含糊不清。从其文章来看，他们强调地下组织和政治鼓动，但没有公开提到人民战争或任何形式的军事斗争策略。这可能出于安全考虑不便明说，但也可能反映了托派式的“等待条件成熟、市街起义”思路。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革命不是自发发生的暴动，而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过程。毛主席在敌强我弱的中国走人民战争道路，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再夺取城市政权，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之路。当代中国尽管情况变化，但无产阶级推翻强大镇压机器的过程依然不可能一蹴而就，离不开军事斗争。这方面，“共产主义者”网站没有给出任何战略规划，反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理论批判和组织发展上。他们似乎设想只要建成一个严密的地下党，在未来危机时刻可以领导群众起义，就能夺权胜利。这种设想如果缺乏人民战争观念的指导，恐怕很容易重蹈城市武装起义遭血腥镇压的覆辙。



再次，他们自诩很重视实践斗争，但实际上其活动重心仍偏于宣传和争论。他们批评一些左翼只顾办报纸或者盲目“融入工人”而不建党，认为这两种路线都有片面性。他们自己的路线据称是两手都要抓，既开展工人运动，又创办政治性刊物，同时秘密建党。听起来全面，但操作上对资源和力量要求极高。目前中国左翼力量本就微弱，他们却贪多求全，结果可能每一方面都流于表面。这从他们网站文章产量之高（几乎涵盖时事、历史、理论方方面面）也可见一斑。他们投入大量精力写作批判文章、同其它左翼论战，却未见报导多少亲身领导工人斗争的实际经验。真正的革命路线应当是扎根群众、带领斗争，以理论指导实践、再从实践中检验理论。而“共产主义者”网站给人的印象是笔杆子甚于枪杆子，口头革命多于实际行动。即便他们声称自己不是那种只会网上骂战的“网左”，但目前为止，他们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仍十分有限。这种脱离群众的空转，很可能让他们幻想的“革命党”成为自我中心的小圈子。

历史观：美化托派遗产，贬低革命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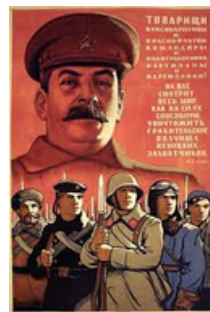
“共产主义者”网站在革命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带有明显的托派倾向，充满对马列毛主义历史的曲解和对托洛茨基的同情乃至颂扬。

首先，他们高度评价托洛茨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在《托洛茨基主义评析》中，他们列举了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创建红军的功绩，称托氏“提出了新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且符合俄国国情的革命策略”。他们还肯定托洛茨基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必须依赖世界革命否则难以巩固”的“不断革命”理论，详细解释了落后国家建立无产政权后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这一观点认为：没有发达国家的革命支持，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终将陷入生产力和文化落后与先进制度之间的矛盾，外有帝国主义封锁，内有复辟压力，最终不是官僚蜕变就是资本复辟。这实际上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核心要点。

且不说托洛茨基提出这个论断的历史背景，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一国难以建成社会主义、必须世界革命”的命题值得辩证分析：它有部分真实性，但被托派夸大为绝对真理，从而否定了在被包围情况下长期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马列毛主义者当然承认世界革命最终必须胜利，否则社会主义阵营长期孤军奋战会有风险。然而，斯大林领导苏联在极其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仍进行了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二战中击溃法西斯，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在苏联变修、帝国主义封锁的情况下，坚持了近30年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探索，尤其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试图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这些都是伟大的创举。虽然最终苏联解体、中国复辟，证明单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复辟风险，但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实际上找到了延缓和对抗这种风险的办法。如果没有文革的发动，也许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更早就发生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来不承认文革的进步意义，反而往往与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将其污蔑为“浩劫”。“共产主义者”网站对此类重大历史经验没有明确表态，但从他们言必称托洛茨基、不提文化大革命来看，其立场可想而知。他们痴迷于托派的理论预见，却看不到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对“社会主义一国建设难题”的创造性回答。这正是托派历史观的局限所在：悲观宿命地认定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却不愿承认毛泽东在延长社会主义寿命、发动群众批判走资派方面所做的伟大尝试。

其次，他们刻意丑化和贬低了斯大林时代的共产主义运动路线，把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出现的失误完全归咎于所谓“斯大林派”。例如，他们重复托派的老调，指责斯大林1928年后的“第三时期”战略是“极左冒险主义”，机械地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结果分裂了工人阵线，导致1933年德国革命遭受灾难、希特勒上台。的确，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教训是教训，但托派指责斯大林不搞统一战线、害希特勒上台，却回避了托派自己在德国也没有提出比共产国际更切实可行的方案。更严重的是，“共产主义者”网站沿用了托派的说辞，把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英国1926年大罢工受挫都归因于“斯大林的策略性叛卖”。他们写道：“斯大林集团…直接导致1925年英国总罢工与1927年中国革命的策略性叛卖。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却被斯大林集团污名化为‘托洛茨基主义’…”在这段叙述里，北伐革命失败的责任似乎不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不在中国革命自身的局限，而全是斯大林远在莫斯科发号施令所致；而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正统！这种历史结论，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南辕北辙。毛主席从不认为托洛茨基有任何功劳，相反，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当然有共产国际瞎指挥因素，但并非如托派指责的那样，是要与国民党“合作”导致的失败——恰恰是陈独秀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和武装斗争）。而托洛茨基当时鼓吹的路线（反对与国民党任何合作，一味城市武装起义）在中国环境下同样不切实际。



历史证明，中国革命既不是斯大林的简单指挥所能成功，也绝非托洛茨基方案可以奏效，而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开辟新道路。可“共产主义者”网站完全站在托派一边看历史，一味渲染斯大林的“叛卖”和托派的“坚持原则”，这是对革命先烈和历史真相的歪曲。这样的历史观，不是托派又是什么？

再次，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耐人寻味。纵观该网站文章，很少见到对毛主席的正面评价和详细引用。在“不是某人之派”的论述中，他们说不会把任何历史人物当作百分百正确或错误来看待。这似乎把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导师并列看待，没有特别突出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毛时代的中国，他们除了高度评价“抗美援朝”（在别文章中提及朝鲜战争中国抗击美帝的进步作用），几乎没有提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文革的成就。这种沉默本身就说明，他们并不真正继承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托派历来敌视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者”网站虽然嘴上不骂毛，但采取了冷处理和降温的方式来削弱毛主席的光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容易使不明真相的青年轻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重要性，从而割裂与中国革命优良传统的联系。

总之，该网站在历史问题上处处体现出“亲托反斯”的倾向，掺杂着对毛主义的低评和忽视。这种历史观服务于他们当前的政治需要：抹黑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所谓“教条宗派”，为自己标榜的不分派别的“新革命”张目；同时淡化托派昔日的错误，把它包装成被迫害的真理。对此，我们必须坚决揭露：否定马列毛革命史，就是否定革命道路的正确性。美化托洛茨基、诋毁斯大林和事实上的贬低毛泽东，是彻头彻尾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机会主义。马列毛主义者应该以科学态度评价历史功过，但绝不能任由托派翻案颠倒黑白。实践已经证明：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而不是托洛茨基路线。任何歪曲这一点的论调，都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害。

国际主义路线：真国际主义还是“左”宗派？

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列宁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指出：“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单独一个国家的胜利是不巩固的。”毛泽东也说过，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然而国际主义并不意味着否认局部革命的价值，更不是要充当帝国主义帮凶去破坏其他国家的反帝斗争。我们需要透视“共产主义者”网站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看看他们的“国际主义”究竟是真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托派式的宗派主义。

但是，仔细分析他们的逻辑，仍能发现托派思维的影子：他们极力凸显“一国革命不足恃，必须引发连锁反应”，特别强调落后地区的工人国家因难以撼动世界资本主义，很容易官僚化失败；相反发达地区的工人国家成功机会更大，但若孤立也会倒退。这些观点与托洛茨基当年对苏联的判断如出一辙。他们得出结论：避免失败的根本出路在于将单一的工人国家变成国际革命网络的“能量中转站”，通过技术、经验输出，跨国动员，把局部突破转化为体系性危机。换言之，就是尽快把星星之火烧成燎原大火。如果不能，那工人国家就难逃灭亡命运。

这种论调有道理的一面，但过犹不及：托派正是因为过度强调这一点，而往往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缺乏应有的支持，反而以“他们必然蜕变”为由放任其被帝国主义颠覆。例如，在二战后托派长期攻击苏联是“官僚畸形的工人国家”乃至“国家资本主义”，不支持国际共运对苏联的声援和保卫，把苏东剧变看作某种必然（有的托派甚至幸灾乐祸地认为“证明了托洛茨基早说对了”）。这种态度与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我们既要推进世界革命，也要维护每一个已经胜利的革命果实不被反动派扼杀。毛主席在世时坚定支援世界各国人民斗争，同时也坚决保卫社会主义阵地（如援助朝鲜、越南抗击美帝）。托派则常常以“反对斯大林官僚”之名，对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消极甚至幸灾乐祸的立场。

“共产主义者”网站目前没有明确遇到类似现实考验，因为当今世界幸存的名义社会主义国家仅剩寥寥（如朝鲜、古巴），而他们主要聚焦中国事务。但从其理论倾向推断，他们很可能认为朝鲜、古巴也已不是合格的无产阶级政权，不值得无条件声援。在他们眼中，只有他们将来建立的“真正”工人国家才值得支持；现在世界上存在的都不是。这种潜在想法其实是典型的托派宗派心理——眼中没有半点灰色地带，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纯净天国，就是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但现实往往复杂得多：民族解放运动、反帝统一战线往往会产生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形态。马列毛主义一贯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支持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进步运动，同时保持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不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这需要灵活而坚定的策略。而托派宗派往往简单化处理，要么全盘否定（如斥印度民族运动、埃及纳赛尔主义为反动），要么一厢情愿套用欧洲式的阶级模式，结果陷入孤立。



以台湾问题和中美冲突为例。“共产主义者”网站发表文章《我们对台海冲突的立场：主要敌人在内！》，提出在可能的台海战争中，两岸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反对各自统治阶级，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把选择框架定义为：“不是帝国主义胜利、文明毁灭，就是社会主义胜利”。这种论调深受列宁“失败主义”策略和托洛茨基“革命反战”思想影响，看似激进。然而在现实操作上，如果美帝与中帝在台海兵戎相见，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当然不应变成沙文主义者去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打仗，而应利用战争危机宣传革命。这一点毛泽东也讲过：“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策略。然而，毛泽东同时在抗日战争那样的侵略战争中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也就是说，在不同性质的战争中，革命者的策略可以不同。如果帝国主义进攻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革命者应当保卫民族独立，同时争取在战争中壮大革命力量；而帝国主义相互厮杀时，则应该各国内部倒戈革命。托派的错误在于，他们往往不会区分主要和次要矛盾，一律机械地套用“内乱优先”。二战期间，几乎所有托派都拒绝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甚至骂抵抗运动是为盟军卖命，这在实践上陷入了与人民为敌的尴尬境地。

回到台海问题，“共产主义者”网站喊出“第三条道路”，实质就是要两岸同时革命，反对所有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介入。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结局，但若在近期难以实现呢？他们对美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着墨不多，反而集中批判大陆与台湾执政当局，强调工人要反对“战争及其方法即帝国主义”。这样的宣传有可能在战争爆发时引起误解——仿佛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反动派镇压是相同的，不分主次一起反对。马列毛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头号公敌。中国虽为新兴帝国主义，但在中美矛盾中，美国仍是更强势更主要的帝国主义，对全球危害更大。因此中国革命者在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同时，也反对美帝对中国的遏制围攻。即既不当华府的应声虫，也不当北京的吹鼓手。这一立场需要清晰的斗争艺术。而托派式的“一切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笼统口号，可能忽视特殊矛盾。从这点看，“共产主义者”网站的国际路线带有一种左倾幼稚性，即革命口号提得很猛，但是否有具体策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却少有实质内容。



真正的国际主义，不仅体现在理念口号上，更体现在对现实中不同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和态度上。当前世界上还有不少革命武装斗争在进行：如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人民战争、菲律宾的新人民军、土耳其、秘鲁等国毛派的游击战争，以及拉美、非洲一些反帝民众起义等。马列毛主义者坚决支持这些正义斗争，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那么“共产主义者”网站对此是什么态度？遗憾的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对这些革命运动的报道或声援。相反，他们大量篇幅在批评其他中国左翼和回顾历史，却没有呼吁声援国际同志。这很难不让人格外警惕：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岂能对当今活生生的世界革命浪潮视而不见？除非他们内心并不认同这些以毛主义为旗帜的革命，或者害怕触及这些内容暴露自己的托派立场。所以，他们选择性失语。这种倾向表明，该网站的“国际主义”更多停留在抽象议论上，而缺乏实质的行动或支持网络。他们也没有同国际马列毛主义阵线建立任何公开联系，却热衷通过Telegram等建立自己的“小国际”频道。这种做法，与托派各自为政组建第四国际支流何其相似！倘若每个宗派都只承认自己是真革命而他人为落后、“墓碑”，国际队伍如何形成统一战线？

综上，“共产主义者”网站口头拥抱国际主义，但其内涵实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思路和宗派习气的混合体。他们缺乏对现实反帝斗争的辩证支持，代之以空洞号召；他们漠视当代毛主义革命运动的贡献，热衷自说自话。这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真正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应当既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宗派主义，而是把支援各国人民斗争与推进本国革命紧密结合。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者”网站还有很大差距。

统一战线与组织策略：高喊团结却加剧分裂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战胜强大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语）。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斗争阶段，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哪怕是带有各种缺点和动摇的盟友。同时，在革命队伍内部，不同思想倾向也需要通过批评和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而不是轻易分裂。马列毛主义在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遗憾的是，“共产主义者”网站虽然口头反对宗派主义，但其实际作为和效果却与宗派主义无异：不是造成革命队伍的进一步分裂，就是以“团结”之名行宗派扩张之实。

首先，看看他们对待其他左翼团体的态度。该网站有一篇文章直接点名批判了一个名为“马列毛大群”的左翼电报群组，标题就叫《马列毛大群：南辕北辙的宗派主义者》。文章开篇即嘲讽对方最近闹出的“笑话”：为了捍卫共产主义、反对机会主义，该“大群”连发数十篇文章，措辞极尽侮辱挖苦，对各革命组织大打出手，结果还导致一些组织信息安全受威胁。显然，“共产主义者”网站指责马列毛大群搞“批斗”、“扣帽子”、“打成反动派”，是典型的宗派山头，大搞分裂。他们指斥大群的批判文章只是发泄仇恨和诅咒，“每个字眼都带着一种仇恨，仿佛犯错的同志比资本家更可恶”；说大群的人“眼高手低”、“没有耐心，更没有政治领导力”，不懂得教育同志，只会逞一时口舌之快。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者”网站将这些激烈批判他们的人描述得不堪一击，认为那些人只是躲在舒适圈里“捍卫偶像、捍卫过去”，口头喊持久斗争，骨子里却不想真干。

姑且不论该网站对马列毛大群的具体指责是否客观全面，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前中国尚未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各种小组、派别林立。这种状况固然不利于革命，但并非靠一方猛烈抨击他方就能解决。需要的是在斗争中不断讨论、批评、说理，以求逐步在正确路线下团结。但“共产主义者”网站和某些毛派群组的争论，正如该文标题所示，是严重的“南辕北辙”——双方都以为对方在背离革命方向，因而针锋相对，矛盾日深。这种内斗最终只会令革命者雪上加霜，让群众更加迷惑疏远。令人遗憾的是，“共产主义者”网站一方面指责别人宗派，另一方面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反击对方。从他们文章的遣词用句中也能看到浓浓的火药味和优越感：称对方是“十几年前老左派的产物，最僵化宗派头脑的墓碑”；讥讽对方“比自己高的想拽下来，比自己低的看不起，愚蠢至极”；指责对方“立场先行”，凡与己不同就打成反动派，“为了治病直接把病人杀了”。不可否认，该网站对大群某些作风问题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中国左翼确有以口水仗代替说理教育的恶习，需要克服。但问题在于，他们的批评本身也充满了刻薄和仇视。他们并没有真正以同志身份去耐心说服（私下交流等），而是公然在网上将大群批了个体无完肤。这种做法是否也在火上浇油地制造分裂？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果说马列毛大群的宗派表现是用粗暴批斗来“净化队伍”，那么“共产主义者”网站的宗派表现则是一边高喊反宗派，一边自己成立山头并挖其他组织的人。该网站多篇文章都透出这样一个信息：他们认为目前别的左翼团体不是宗派僵化，就是涣散妥协，只有他们的组织路线才最正确，能够团结一切真正革命者建党。他们公开表示要“基于路线共识团结其他团体中认可我们主张的人”，在可能时“鼓动他们并入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遵循我们的路线和方法来工作。换句话说，不是与别的组织平起平坐联盟，而是要将别人分化瓦解，收编进自己的队伍。在他们眼里，“中国需要且只需要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而这个党当然就是由他们来发起和组成的。因此，别的任何团体若不愿解散并入，就是挡路的“山头主义”。这种心态看似站在革命大义，实则隐藏着“唯我独革”的宗派私心。因为没有经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充分的协商，就自封为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要求别人无条件接受，这本身就是宗派主义的体现。

“共产主义者”网站痛斥马列毛大群等“山寨小圈子”是把团体私利置于革命利益之上，不愿联合他人。但反过来看，该网站自己何尝真正尝试过与别的毛派或其他革命派平等合作？除了发表檄文攻击对方，他们并未提出过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联盟方案。真正反宗派的人，应该拿出博大的胸怀和高超的策略来化解分歧、建立统一战线。比如在共同的敌人和斗争目标上先协同行动，边实践边讨论，在斗争中统一认识。可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像是要在理论上先压倒别人，进而在组织上“兼并”别人。这与他们口口声声的“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里通过辩论加深了解再实践检验”并不相符。纸面上他们说得很好，反对那种“一句话不合就割裂队伍、互相巴不得对方完蛋”的心理。可是，到了现实中，他们和大群不就是互相巴不得对方声名狼藉、组织瓦解吗？凡是不认可他们的人，就被视为“不愿战斗、固守偶像、自我纯洁的老左”；而在大群看来，他们则是“托派修正主义”，需要以“千钧棒”痛打。如此水火不容，岂有半点无产阶级同志间的情谊？



还有，该网站宣称自己内部是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私人成分”和“仕途主义”。他们批判大群害怕新人加入会削弱自己地位，因此拒绝联合。但这一指责恰可用于反观自身：他们组织如果真有吸引一些原属他团体的人加入，是否也会有既得利益者的考虑？是否真的做到完全的无私？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如果缺乏制度约束和思想改造，新组织同样会产生山头 and 派系。事实上，他们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承认第四国际的频繁分裂给了教训，指出健康的民主集中制应允许不同意见充分讨论，并在持续的政治工作中检验理论，否则不鼓励理论活力只维护正统也会导致停。这话不错。但回头看他们和大群的争执，双方何尝不是都以“捍卫革命正统”自居，而缺乏一个共同实践的平台？“共产主义者”网站批评大群“不再重视中国革命利益，而是像商业竞争、敌国征战一样对待其他组织”。这个比喻入木三分。然而，他们自己对待不同意见者所采取的攻势言辞，也几乎是“视政治论战如战场”。两军交火，没有合作只有你死我活。这正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大不幸。最后，从组织策略上看，“共产主义者”网站过于急于求成，反而可能适得其反。他们在成立革命党问题上持很强的迫切感，认定“现在就必须开始进行”建党工作，不能等。这本是对的，问题在于建党是为了解决思想和组织涣散。但如果建党的过程本身造成更大的分裂呢？他们目前的人力物力还远远无法号召全国，过早树起一个旗号自称“革命阵线”，却没能团结多数现有左翼力量，那么建党号召就可能变成另一块小天地。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业，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统一战线。他们指责一些同志因为团体宗派化就退群躺平是错误的——这不错。然而如果急于推出一个新党而造成已有团体土崩瓦解、人心思散，又何尝不会让更多同志灰心？历史上，托洛茨基在1938年建立第四国际时也踌躇满志，以为旧的“叛徒组织”很快覆灭、第四国际将成决定性力量。可现实是第四国际始终实力微弱，还不断分裂。这给我们的教训是：团结是斗争出来的，不是宣布出来的。谁都想建成一个大党，但如果方法不对头，反而会四分五裂。遗憾地看到，“共产主义者”网站虽熟知托派组织失败的历史，却似乎重蹈着类似的覆辙：以为靠一套正确的纲领和热情就能号召四方，实际上却陷入和周围团体的纠纷，难以自拔。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者”网站的统一战线策略和组织路线存在明显的宗派主义倾向：口号上高喊团结，行动上排斥异己；批评别人的粗暴不宽容，自己也缺少耐心和诚恳；急于建党但方法简单，缺乏实事求是的灵活。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宗派导致分裂、损害革命力量；机会导致原则丧失、路线偏离。该网站一方面奉行托派修正主义路线（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在组织上又我行我素、攻击同志（宗派主义），可谓两种错误兼而有之。这样的路线不可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只会在实践中碰壁，为历史所证明其谬误。

结论：伪托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危害革命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共产主义者”网站及其幕后组织共产主义革命阵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推行的是托洛茨基主义掺杂着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他们在理论上标榜反宗派、反教条，实际是否定马列毛主义发展脉络，宣扬折中修正思想；他们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战略问题上表面承认帝国主义论，实则缺乏鲜明的革命策略，带有托派轻视农民、寄望自发起义的影子；他们在历史评价上为托洛茨基翻案，贬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贡献，鼓吹一种变相的“托派正统”论；他们的国际主义口号激进空泛，却忽略实际反帝斗争，显示出脱离实际的左倾宗派心理；他们高呼团结建党，但采取的却是攻击其他革命者、分化友军、收编山头的做法，导致更大分裂。所有这些，充分说明该网站是一股披着“革命”外衣的修正主义逆流。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凡是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路线，不论打着多“革命”的辞藻，最终都会把革命引向歧途。托洛茨基主义自称最“左”最

“国际主义”，结果多次陷入脱离群众的泥淖，在中国更是早早破产。今天，这股思潮以新的面目出现，企图通过吸取部分毛主义语言来伪装自己，但其要害并未改变。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提高警惕，认清“共产主义者”网站鼓吹的所谓新路线其实是沾满历史陈腐教条的旧药，不过包了层糖衣而已。糖衣之下，是对革命原则的抛弃，对正确路线的篡改，对同志的分裂和攻击。这对中国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当然，我们批判他们，并不是要将所有受其影响的青年一棍子打成敌人。相反，正如毛主席所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相信，许多认真投入该组织或关注该网站的同志，初衷是要探索革命真理，只是暂时被错误路线所误导。我们的批判正是为了帮助这些同志认清问题、回到正确道路。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斗争，目的应在于团结多数人共同前进，而不是搞宗派清洗。在这点上，我们与“共产主义者”网站所批评的和所践行的都大不相同。我们既反对“大群”式的不加分析乱扣帽子的粗暴方法，也反对“共产主义者”这种口是心非的假团结，主张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服教育。

毛泽东曾经告诫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各种思潮充斥的环境下，中国革命者尤其要提高理论鉴别力。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光辉实践，足以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对于那些违背这些基本原理、却又披着“更革命”外衣的人和组织，我们务必要保持清醒头脑。革命的敌人，不仅有明刀明枪的资产阶级统治者，还有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修正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他们的破坏作用有时更为隐蔽却危险。通过这篇批判，我们指出了“共产主义者”网站的谬误所在。但更重要的是呼吁广大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团结在真正的马列毛主义革命纲领之下，而不要被伪革命的噪音所分散。我们主张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团结——这一原则，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路线，包括对中国帝国主义性质的清醒认识、对工农联盟和人民战争道路的坚持、对革命历史遗产的正确继承、对国际主义的辩证把握，以及对统一战线和纪律的严格遵循。在这些原则上绝不妥协；在此基础上，欢迎一切真诚革命的同志深入讨论，一起实践。对于“共产主义者”网站的成员和读者，我们同样伸出团结的手：如果你们愿意抛弃托派的成见和宗派傲慢，回到马列毛主义的人民群众中来，我们愿意是并肩战斗的同志。

当今中国革命的任务无比艰巨，需要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先锋队的诞生。这支先锋队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由某个小圈子自封，而须由千千万万革命者在共同斗争中锤炼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坚决批判和肃清一切修正主义、宗派主义的影响，是我们必须迈过的一道坎。让我们以这场原则之争为契机，重申我们的立场：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红旗，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宗派分裂，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真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

编者注：

（1）见列宁选集第二卷，p485-p506，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捷克共和国禁止共产主义宣传

人民之火

7月18日星期五，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宣布了一项新法律，将修改刑法，以禁止那些被认为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构成威胁的思想。根据新法，凡是“建立、支持并宣传旨在明显压制人权与自由，或煽动种族、民族、国家、宗教或阶级仇恨的纳粹、共产主义或其他运动”的个人，最高可被判处五年监禁。

在当前帝国主义危机的时刻，这是一场针对人民及其表达权利的攻击。正如《反对境界报》指出的，捷克国家正在“污蔑共产主义”，并且使用了“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粗俗类比”。在一个曾被共产主义从纳粹占领和恐怖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在纳粹战败80年之后，作出这样的比较是荒谬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有充分理由害怕共产主义思想在捷克共和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他们害怕真正民主和反反动的思想赢得群众支持，因此不断加剧对民主权利的限制，以迫使被压迫人民向帝国主义所认可的思想靠拢。

来源：“人民之火”网站

<https://lesfpcn.wordpress.com/2025/08/03/2807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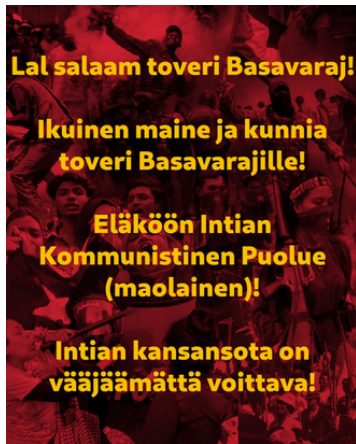


欧洲声援印度人民战争与巴萨瓦拉吉同志的新行动

人民之火

我们在此分享一些欧洲声援印度人民战争及巴萨瓦拉吉同志的新行动。

在芬兰赫尔辛基，反帝组织“赫尔辛基反帝国主义者”号召在7月27日星期日于印度大使馆前举行示威行动，作为国际声援运动的一部分。



在丹麦哥本哈根，反帝国主义行动组织宣布将举办一场包括介绍和放映关于印度人民战争及被压迫民族和种姓所受压迫的纪录片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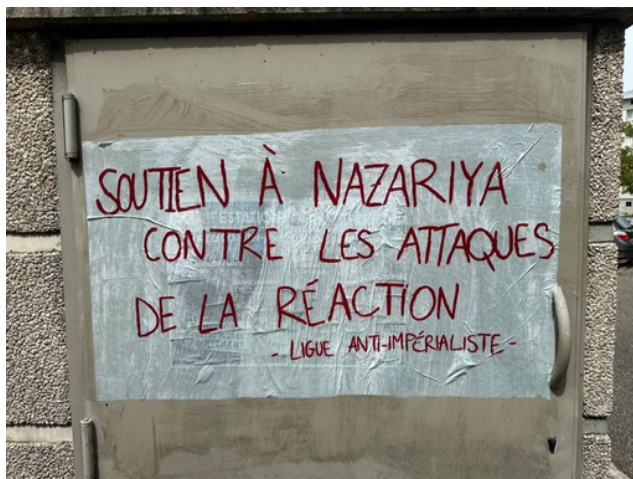
来源：红旗(丹麦)

在法国，反帝联盟（LAI）在斯特拉斯堡的工人街区张贴了大字报，声援印度人民战争并谴责“卡加尔行动（Operation Kagaar）”。这些街区也是党人（Partizan）和革命青年联盟（Ligue de la Jeunesse Révolutionnaire）活跃的地方。他们同时也向乔治·阿卜杜拉及巴勒斯坦表示敬意。





在葡萄牙，反帝行动组织（AAI）在里斯本进行行动，张贴了使用葡萄牙语和佛得角语的海报。海报向印度人民战争、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以及牺牲的总书记巴萨瓦拉吉同志与26名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致敬，同时谴责“卡加尔行动”。



来源：欧洲新闻 (Avrupa Haber)
在西班牙国家的瓦伦西亚，革命委员会组织举行了一场关于印度人民战争的报告会。会议中回顾了印度革命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巴萨瓦拉吉同志及27位革命者的牺牲事迹。





来源：葡萄牙为人民服务

来源：“人民之火”网站

<https://lesfpcn.wordpress.com/2025/08/03/26072025-2/>

CULPGIA：关于解放乔治·阿卜杜拉的声明

人民之火

我们分享一份我们收到的 CULPGIA 关于阿卜杜拉的声明的非官方中文翻译。

“每当我们看到希望与尊严绽放时，背景中总能映照出那条漫长的抵抗之路。抵抗，再抵抗，直到力量的天平被扭转。”

——乔治·阿卜杜拉，2009年4月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同志们：

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里，我们曾无数次高举的口号，如今已获得了它完整的意义并被付诸实践：“胜利，或胜利！”

这场胜利首先属于乔治·阿卜杜拉，属于所有从第一天起就投入这场长期斗争的支持者们，正是我们共同努力，我们才能赢得胜利。

当然，今晚我们的思想，我们所有的思想，都与我们的同志同在。他的生命、斗争、解放与胜利如此核心，正如我们与他一同肩负的事业。他多年来的言行始终向我们展现了他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与毫不妥协的抵抗精神，毫无否认，毫无背叛。乔治·阿卜杜拉今晚庆祝的是他支持者们那场决定性而持续升温的动员，这促成了释放他的决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庆祝他一直以来通过自己的战斗精神、政治品格与对事业的忠诚，为这场动员注入了决定性的力量。乔治·阿卜杜拉，你是我们的同志，今晚我们同样庆祝你的胜利。

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怀念所有自2005年以来就投身于这场斗争，打破包围我们同志囚禁的沉默的同志们。我们始终铭记并赞扬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我们怀着感动的心情思念那些过早离世、我们深深怀念的同志。他们一直给予我们坚定支持，我们曾向他们承诺，将为胜利坚持到底。

我们也要感谢那些始终如一表达团结、积极响应号召、在每次行动中全力参与、推动动员规模不断扩大的无名人士。

我们致敬那些热爱正义的公众人物，那些真诚的记者，以及少数几位敢于在媒体平台或议会走廊中揭露这一国家丑闻的政治人物与支持者。

我们向我们同志的律师致以敬意——尤其是让-路易·沙朗赛（Jean-Louis Chalanset）——在这一漫长而特殊的法律斗争中，他们无私投入，为这位特殊的囚徒争取正义。

来源：“人民之火”网站

<https://lesfpcn.wordpress.com/2025/08/02/21072025/>

我们感谢所有集体、委员会、协会、工会和政党的政治活动家，正是他们的多样行动让乔治·阿卜杜拉的解放诉求，成为各场斗争中的必要组成部分，贯穿始终。

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国际支持者，他们以国际主义精神，不顾遥远距离，理解并传播乔治·阿卜杜拉的反帝、反犹太主义斗争。他们支持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解放斗争——从温哥华到突尼斯，从墨西哥到贝鲁特，从安卡拉到都柏林，以及整个欧洲。他们也曾任在法国国家驻外机构前参与力量对峙的一部分。

我们还要特别致敬这股“积极青年浪潮”的同志们：革命青年联盟、革命青年、学生会联合会，以及巴勒斯坦各共产主义青年与学生组织。他们的真诚、活力、投入、忠诚以及对阿卜杜拉同志政治立场的坚定信念，使得这场全国性动员得以开展——在大学、在法国各地的工人社区，甚至在我们城市的核心广泛传播并壮大声势。

最后，我们要向所有支持者与组织致意，正是他们理解到开展一个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基础上，共同扩大规模、加强力量、协调行动，在地区、国家与国际重大场合中统一发声，有力宣传乔治·阿卜杜拉的政治立场与斗争——正如他自2015年来一再要求的那样。我们要向那些始终真诚投入的组织致敬，正是他们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构建了这一广泛的网络，让解放乔治·阿卜杜拉的斗争成为前所未有的重要斗争象征，彰显了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与其英勇抵抗的团结与积极支持，这两者本质上不可分割。他们始终高呼并传唱着这场事业的核心口号：

“巴勒斯坦必将生存！巴勒斯坦必将胜利！自由属于乔治·阿卜杜拉！”

如今，乔治·阿卜杜拉获得自由！巴勒斯坦必将胜利！乔治·阿卜杜拉一直宣告并证明：另一个未来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他今日的解放正是这一点的有力体现。这只能更加激励我们继续为巴勒斯坦、为整个巴勒斯坦的斗争而战，并更广泛地为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解放而奋斗——胜利，或胜利！

巴勒斯坦必将生存，巴勒斯坦必将胜利。胜利，或胜利！

团结是我们的武器！

让我们继续为所有巴勒斯坦囚徒与革命者的自由而斗争！

红色国际主义的、团结的问候，

乔治·易卜拉欣·阿卜杜拉解放统一战线（CULPGIA）



共产主义原理（第二部分）

德国
F·恩格斯

第六个问题：在工业革命前，有过什么样的劳动阶级？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直到今天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他们还是这种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他们还是这种农奴。此外，在中世纪，直到工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渐渐出现了受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单个的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与主人利害攸关，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单个的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财产，他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作物，不被看作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占有并使用一种生产工具，即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份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份收益。农奴是交出，无产者是得到。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获得解放。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16至18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工场手工业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农村，和地主或雇主维持著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而变成无产者。

导师语录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批判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一年纲领草案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南京照相館